拆除分裂的壁障



朝鲜·平壤

1991

拆除分裂的壁障

（摘自日本杂志）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9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107287

出版说明

最近几年，日本的《世界》、《统一评论》等杂志刊登文章揭露现南朝鲜法西斯政权的真面目，并介绍了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为反对这一政权、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情况。

本社选择其中的部分文章，用各国文字翻译出版。

目　　录

1 南朝鲜的“第六共和制”和民众的呼声
——卢泰愚新政权下的南朝鲜现状
伊藤千寻 ……… 1

2 必须查究光州惨案真相
赵德圭 ………… 19

3 再论南朝鲜当局所说的“南北对话论”
——关于破坏对话的逻辑
康德珠 ………… 49

4 官方统一论的轨迹
康德珠 ………… 65

5 南朝鲜当前的焦点 ……………………………… 96

6 拆除分裂的壁障
文益焕………… 107

南朝鲜的“第六共和制”和民众的呼声

——卢泰愚新政权下的南朝鲜现状

伊　藤　千　寻

5月18日，是“光州事件”8周年的日子，即8年前，1980年在南朝鲜全罗南道光州市发生市民起义，而起义群众惨遭大屠杀的日子。今年2月底，卢泰愚上任时曾许下诺言，要把光州事件的善后处理当做首要政治课题。但是，民主势力，尤其是光州市民依然以满含怨恨的神情注视着“新政权”。

南朝鲜真正的“普通人”对挂出国民和合、民主化等口号伪装成“普通人”登上宝座的“卢总统”的看法究竟如何呢？

继全斗焕时期的高压强权统治之后，民主化之风稍有起色的今天，为实现民主化，国民本身有何动向？此刻，民主化势力以何种势力为靠山？

值此“第六共和制”起步之际，我有幸走访了南朝鲜的中心城市汉城、反政府情绪根深蒂固的光州市和卢泰愚本人的出生地庆尚北道大邱市等三座城市，想借此机会介绍我在这些地方耳闻目睹的南朝鲜社会的实况。

年号：阳88与阴44

“距88奥运会开幕还有××日”字样的牌子在南朝鲜到处可见，汉城车站大楼正面、光州市的全罗南道道厅办公大楼正面和大邱市的某小学校舍正面等，比比皆是。

同时，人们还可以到处看到说明今年为第44年的字样。贴在汉城市各大学校区内的大字报和撒在光州市街巷的民主化运动传单上标明的并非公元1988年，而是“国家分裂44年”。这几个字，如实地反映着人们对刚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国家就被分裂这件事所抱的怨恨。

“阳”88与“阴”44，这两个数字，一个反映发扬国威之企图，一个反映民族之悲痛心理。卢泰愚的“第六共和国”就在这种时刻登场。

怒　　火

正当卢泰愚就任“第十三届总统”举行“就职宣誓”时，座落于距汉城以南近三百公里的光州市的全南大学学生会馆前布告牌上贴满了十五张大字报，吸引着

学生们的注目。在道林纸上用红色和黑色蜡笔写的大字报里，有这样的语句:“要把卢泰愚的就职典礼变为卢泰愚的葬礼。要让屠夫卢泰愚饱尝诅咒的火焰和憎恨的石块弹,而不是拿花束和鼓掌表示的欢迎和祝贺。”

别的一些大字报也用激烈的语气谴责了新政权:“杀死一个人就是杀人犯,杀死众多的人就会变成伟大的普通人。”这句话正是尖锐地揶揄卢泰愚的。

有的大字报上写道，缅甸仰光事件、金浦机场爆炸事件和“大韩航空客机事件”等三大事件都是“由全斗焕和卢泰愚一手制造的恐怖事件”。大部分的大字报上的落款是“粉碎光州屠杀元凶卢泰愚掌权斗争委员会”，填写的日期为“美帝强占、祖国分裂44年”。

贴在学校正门上的落款相同的大字报，在明白地号召开展抗议斗争:“下午三点，在道厅前举行粉碎卢泰愚掌权斗争大会。处决不让民众活下去的卢泰愚!”他们要展开反对新政权的斗争，就想在这个八年前投入空降部队杀害2 000市民制造光州事件的中心舞台——道厅前的广场开始。

在下午三点之前，身着保护色制服，手持护身板的机动警察队早已在道厅前大公路——“锦南路”两旁摆开了阵势待命。此外，旁边还有一伙头戴白色钢盔身着便服的机动警察队。因为他们头上的白色钢盔使人联想到头骨，由此得名为“白骨团”。他们一旦同学生交手,着装的机动警察队就离的远远地发射催泪弹,

而“白骨团”则利用这个机会冒着雨点般飞来的石块弹和火焰瓶，突进学生群里施威，狠命踢打。市民对“白骨团”恨之入骨。

过一会儿，面向马路的光州天主教中心七层楼的最高的一扇窗户上，一个扩音器突然响起了“阻止卢泰愚掌权，建立民主政府！”的口号。当时，在马路上的约有一百名的市民即刻手拉着手唱了暂作国歌的爱国歌，同时，由天主教中心楼上撒下了传单。油印的传单字迹不太清晰，上面写有“光州惨案主犯卢泰愚是民族的仇敌，粉碎舞弊掌权，争取民众的生存权！胜利属于民众！”“反对美国撑腰的卢泰愚篡夺政权；废除进口关税；把美国赶出去！”等口号。在远处观望的市民渐渐向中心楼靠拢来。我拾一张传单念着，突然双眼火辣辣地刺痛起来，原来警察开始发射催泪弹。这时，足有两个排的头戴防毒面具的机动警察向群众扑了过来。

人们霎时被驱散，便衣警察逮住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倒扭住胳臂拉走。这一天，不只在道厅办公楼前面举行示威，在市区各个地点都举行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名叫“奇袭示威游行”的示威。哨声一响，装成行人的群众立时集聚编成队形，撒传单举行示威，警察队赶来就投掷石块和火焰瓶。我坐车在市区转了一圈，马路上一处一处地散着一地玻璃片和小石块，市区笼罩一层烈性催泪弹毒气，我虽戴上了事先准备的

口罩，还是不顶用，不住地打喷嚏。据说，现今在南朝鲜用的催泪弹毒气，在世界上最毒，其中在光州用的催泪弹的毒气更浓。前一次，他们在市区里的大学向群众打的催泪弹的毒气，一直扩散到坐车须驰二十分钟才到的市中心，那里的人们也得用手绢掩住鼻子和嘴才行，从来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女学生们也表示担心说，“因为时常呼吸毒气，怕不能生育”。

正当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时，也有带着花束的学生和市民到市郊光州惨案遭难者的公墓去省墓。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十名学生队站在写有“五月光州之好男儿○○○烈士之墓”字样的一百零一座坟墓前，行了两次鞠躬礼，然后齐声合唱了一首歌：

共同战斗过的同志虽不能再见，
旗帜仍然迎风招展，
不拘岁月流逝，山河将作证，
怒火喷发热血的心脏，
我们一心勇往直前。

这些学生里，有从汉城赶来的。他说：“全斗焕和卢泰愚，对光州惨案都负有责任。他们都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卢泰愚就任‘总统’，毫无正统性，绝不该允许他就职。”有人提问，他对新政权有何所求，他答道：“对卢泰愚有所求，其本身就是天大的笑话。去

年6月开端的抗争，还没有终结。我们将用我们的双手争取我们之所求，根本不想向卢泰愚去求什么。”冷风飕飕，颇有凉意，握笔写字的手腕都快要麻木了，而祷告声和歌声却持续不断，此起彼落。去年6月，被催泪弹击中头部牺牲，从而把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汉城延世大学学生李汉烈的墓前放有7束菊花。他的墓碑上刻有十字架和“基督教徒烈士全州李汉烈之墓”的字样。三座“无名烈士墓”前放有装有鲜花的玻璃盒。流逝的8年岁月，非但未能湮灭这一惨案，反而更加深了人们为这一惨案所抱的怨恨。

我有机会访问了一所民主化运动的据点。据说，在全罗南道举行示威游行时所用的旗子、横幅和标语牌等都是在这里制作的。“我要向对南朝鲜朝民主方向发展有所理解的日本朋友说几句”这里的年轻负责人这么起了头之后，继续说：“提请你们多加注意防止，自民党的军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一手控制南朝鲜的情况出现。在冷战的恐怖中，南朝鲜和日本即将变作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据非官方的调查资料证明，由于座落于光州市郊的原子能发电站事故频频发生，落在光州市民身上的放射能多于容许系数的一百倍。

“我们在遭美国的掠夺、人权被他们压抑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至少给我们除掉核污染。

“未能实现民主化也罢，我们希望至少不要重演光州惨案那样的屠杀。”这可能是光州市民发自肺腑的悲

痛呐喊。

时代情感

在光州，要听一听普通市民的意见，那是非常难的。你只要一表明你是新闻记者，对方就闭口不谈，守口如瓶。这并非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意见一旦见报随之而来的政府的报复，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报道机构。他们对报道机构抱有极大而又根深蒂固的不满，认为它们只替官方进行宣传。悬挂在天主教中心的楼房的标语牌上也用大字写有“反对歪曲的和偏于一方的报道”等字样。光州惨案发生时，有许多人惨遭杀害，当地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由于官方的压力，根本没敢报道惨案实况。

在远处，观看抗议集会的人群里，有一个人勉强启齿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全罗道人多多少少都抱有来自地区观点的被害者意识。

“我们本不乐意卢泰愚做‘总统’，但他既然就任总统，望他多少能推进民主化过程。”还有，专卖反政府杂志的一家书店的老板说：“卢‘政权’是靠舞弊选举当选的，因而它没有正统性。但是，我们要求他既然就任总统，就该为在经营经济和政府人选方面努力消除地方主义；弄清光州惨案的真相。”

这种意见，我在大邱也听说过。

有个在竞选时给卢某投票的学生说:“卢泰愚就任‘总统’本不是令人高兴的事，而这是时运所至呀。他是不能免掉在光州犯下的杀人之罪的，应抱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工作才是。”光州市民和广大的国民，都抱有反政府情绪，因此尽管“卢总统”声嘶力竭地高唱国民和合，但要使郁结于他们心中的冰块融化，确是不易做到的。还有，即使是支持卢某的人，也并不一定都从心里信赖他。老实说,卢某如不愿做第二个全斗焕,那么,他就应该除了通过88奥运会的国民和合之外,还要推进民主化；在同北朝鲜的关系方面，也该实行“哥白尼式”的“转变”政策，要超越去年的六·二九宣言，大大前进一步。

培育自由的幼苗

在这种环境中，从去年6月起,民主化运动在全国范围达到了高潮，因被迫接受这一局势发表了六·二九宣言，随之民主化风潮便席卷了全国。这种趋势,由于全斗焕政权倒台，更趋向高涨。代表民主化思潮的是言论。

汉城的各家书店都另设了“出售开禁图书柜台”。柜台上，开禁的图书堆积如山，墙上贴着列有五百多

种开禁的图书目录。站在柜台周围读开禁图书的人简直多得挤也挤不动。在大邱市中心，写有“祝《月刊中央》复刊”字样的横幅标语在人们的头上迎风飘舞。

在光州市，各家书店的社会科学图书柜台上，开禁的图书独揽着读者。

其中有：光州惨案的记录、《社会主义艺术论》、马克思的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文集（共三卷）、连载于《世界》杂志上的《韩国通讯》、影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书刊和诗人郑芝溶的诗集等等。于1980年6月当局勒令停刊的杂志《月刊中央》，时过8年终于复刊了。复刊后的第一期，设一专栏登出图片真实地介绍了光州惨案，还对“第六共和国”提出下列七项问题：①对言论的限制；②军部干预政治；③光州问题；④不民主的教育；⑤排除进步势力；⑥分配之不均等；⑦权威第一等。同时，在复刊词中表明：“民主主义，不会有人赐予我们，而应由我们自己去争取。同样，民主主义的基础——言论自由，也应由我们自己靠自力去拥护和争取，而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力量去获得。

“我们向读者发誓，今后我们不惜牺牲，甘做一撮培育自由幼苗长成大树的基肥。”

在书店，有一个学生聚精会神地读开禁的书，他掩饰不住心里的高兴，对人说：“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引人入胜的书，简直读不过来，可是我还是希望今后更多地发行这种书。”书店的老板也高兴得不得了，他说：

“开禁的书，不论哪一种，都在畅销。所以供不应求哩！”还有不少顾客远远地观看出售开禁图书柜台，有一顾客问我说：“我们不习惯读这么多种的书。我们至今以为关于工人运动的一些书，都是特种书。在日本，普通人也读这种书吗？”他们由于长期受压迫，思想意识被封锁，忽然看见开禁这么多种书，看样子有点手足失措。

申请创刊的，报纸有十九种，广播电台有四座，周刊及月刊杂志每天达十种。

离汉城市中心街道很近的一座楼房上悬挂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有“《瀚盖列新闻》将在三月创刊”字样。（“瀚盖列”音译，意为同一民族——译者）前《东亚日报》编辑局长宋建镐任发行人兼社长，过去曾为争取言论自主化而进行斗争，被社方解雇的那些记者，如今聚集一堂，提出办好“面向国民的报道真情的报纸”的口号，正在大力加紧筹备工作。他们已申明，他们将不受政府的臭名昭著的“报道方针”的约束。他们在为创刊这一报纸告国民的小册子里强调：“今天，我们要创刊时代所要求的国民性的报纸，以期克服言论追随制度的体制上的错误。我们将拒做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和权力的附属品。由于为实现言论自由进行斗争而被解雇或被逮捕坐牢的我们记者，虽遭种种折磨长达十多年，但始终坚持争取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初衷。我们将绝不为压力所屈报，绝不改变要做国民意志代言者

的既定方针。”

对筹措创刊报纸所需的50亿圆基金，他们采用了由普通市民捐募的方法。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东亚日报》曾经为政府所挟持，广告费收入一项被堵，资金周转受阻，吃了不少苦头。他们是根据这一沉痛教训，想出此法的。这又是“开辟一条路，能使每个国民做到言论之主人”的一种方法。

在别的报社当报童的少年，也节用微不足道的工资，捐了不少款。筹措资金的目标，很快就完成，约有3 000人捐款，就凑足了。

2月底举行了录用记者的考试，应考者竟达2 764名，这等于录用人数的一百四十倍。其他业务人员等一般职员都算在内，应考的人数竟超过八千人。只举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国民对该报社寄于多大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劳动条件较好，恰恰相反，他们的薪金同别的报社同一工种相比，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

试举社长宋建镐的例子，他的薪金比别的报社新雇职员的最初薪金还要低。尽管如此，有的记者竟辞掉现在服务的报社来应考，他说：“我很想，在出象样的报纸的报社工作。”

正在举行录用考试时，我利用间隙时间同宋建镐见了面。对即将创刊的报纸，他说：“我们打算起初印出30万份。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南北早日实现自主统一，为实现民主言论、民族言论甘做一根支柱。我和记者

们都有精神准备，随时被捕去坐牢。”对于新政权，他谈到自己的看法说：“卢泰愚要掌权时，杀了不少人，他若允许言论自由，这些事就会被揭露无遗的。自由气氛的缓和必定有限，军人的本性必将显露。”当今的现实，验证了他的话。本来该报预定在3月创刊，但由于政府不认可，只好延至5月了。但是，他强调说：“国民在竭力支持我们，因此，对于我们的活动，政府也将不得不认可的。”

他的言论，证实了要求民主化的思潮有多么高涨。宋建镐预测说：“自4月至5月，将出现要求查明光州惨案真相的动向。”

该报将全用朝鲜文字而一概不用汉字，这是为了显示民族自主性而采取的措施。

尽管政府对禁销的图书开禁，而如今还有不在此例的非法化而仍在发行的杂志。那就是被东亚日报社和朝鲜日报社解雇的记者们于1985年创刊的杂志《话》。该杂志在揭露政府的报道方针的实质等，反对当局的镇压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愿为民主、民族、民众的言论做垫脚石。”这是双周刊杂志，每期印一万五千册，已出20期，印书是秘密的，印出后通过非公开渠道向各家书店发行。

编辑部座落于汉城的一条背胡同里。周围净是贩卖汽车零件的商店，办公楼又极杂乱，他们只占二楼的一间房。房里堆有至今发行的杂志，有十名记者，有

的在写文章、有的在进行商讨。这个办公室经常有警察来搜查，每发行一期，负责编辑的人员就被逮去，因而记者轮流负责编辑，然后就去坐牢一个星期。直到去年6月，每发行一期，就遭当局搜查一次，杂志都被没收。如今，由于要求民主化的波涛汹涌，杂志不再被没收了，但镇压依然如故。登广告的收入寥寥无几，而印刷费又昂贵，因为它伴随着危险。记者的薪金，只有《瀚盖列新闻》社记者的一半。

代表人、前韩国记者协会会长金泰弘就该杂志的方针说："向普通人报道被掩盖的事实和真情，这便是我们的方针。"他还批判说，如今表现的言论自由化的动向，只不过是一种幻影，政府只允许认为对他们自己无害的刊物开禁。据金泰弘说，要真的实现言论自由化，须首先解决六项问题，即：第一，祖国的分裂；第二，阶级矛盾；第三，无视人权；第四，禁止军事报道；第五，对执政党和财阀的神圣不可侵犯；第六，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又主张："应允许对这些问题自由地进行报道。"

民众主义与民众文学

杂志《话》提出的口号里提到的民主、民族、民众的"三民主义"中，民众这一词的概念是什么呢？对此，

金泰弘代表回答说：“它同英文里的people一样，指的是人民。”在南朝鲜，官方规定禁止用人民一词，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里有这个词。因而，用民众这一词来替代。据说，民众所包含的范围甚广，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中产阶层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官僚都包括在内。

《瀚盖列新闻》的宋建镐社长就“民众主义”谈道：“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解放后，曾替日本的殖民统治作过帮凶的那些人，在南朝鲜掌握了主导权。不论是当年还是今天，由受压迫的民众掌握主导权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

只要观察一下南朝鲜的民主化运动，到处可以看到“民众”这个词。

民众一词，在南朝鲜作为含有一定意思的词开始流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学，那时多称民众文学或民众时代的文学。在汉城，我曾同现代南朝鲜文学界的旗手、编纂《光州5月民众抗争记录》的作家、筹备创刊《瀚盖列新闻》的发起人之一的黄晳暎见面，对于“民众”的概念向他请教过一次。

当时，他回答说，到了70年代初，“朴政权”大力推行“先建设，后分配”的经济政策时，民众一词专指那些提供劳动力而得不到分配的工人、农民和贫民。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的一般群众。到了70年代后半期，随着维新体制苛刻地压制社会，人们起来为反对

这一非人的压制进行斗争，当时就把这些人叫做民众。朴正熙遇刺后，伴随第三世界的从属理论开始流入南朝鲜，就指在美帝统治下受折磨的南方全体同胞为民众，至今这一词意未改。这就是民众一词的来由。

那么，现在呢？据黄皙暎说："如今民众一词，带有矛盾。"他说，最近，叫人注目的是，工人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工人运动开始组织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改良主义所迷惑，有不少人要求通过选举来进行改革。去年，6月发生的抗争和7月掀起的工人的斗争，没有很好地联合起来，这就象征性地说明了目前民主化运动的局限性。

光州市，有从事文化方面斗争的光州民众文化研究所，它于1982年黄皙暎等人参加下创立。该所分街头戏（活报剧）、文学、美术、制片、宣传等五个部分，主要是推进民众文化运动。街头戏，继承传统形式，配合讽刺现今社会、政治问题的舞蹈编排的。该研究所里，有十名研究员和二百名会员。会员在研究员的指导下，经过技能训练之后，各自从事演街头戏、用来教育农民的录象、发行有描写煤矿村的板画插页的小说等工作。他们在创刊会报时，拿描写光州惨案当时成为解放区的街道风景的板画做了该报创刊号的封面。

如今该研究所的中心人物洪顾问画了这幅板画。他在直到去年的5年期间，一直任该所代表。他严正批判政府所提倡的关于"文化奥运会"这一表现。他说，政

府要举行的奥运会，是拿金钱搅乱健全的民众文化，使之堕落成妓女观光的勾当。他认为，“政府所以对奥运会集中力量，其目的在于拿文化平息国民大众对现实的不满，到头强化他们的支配力量。”

该研究所的会刊一直发行到1986年1月，即至第三期，被政府勒令停刊。他的宅邸，不时遭到官方搜查，而他如今正在执笔创作描写光州惨案的小说。

为民众服务的神学

如今“民众”这一概念，已渗透于宗教界。具体表现是基督教进步派所推行的“民众神学”。以新教为中心吸收部分天主教徒推行民众神学的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面促进反独裁民主化斗争，一面致力于提高贫民的生活水平。

投身于实行民众神学的牧师当中，90%坐过牢。

有个长老派的名叫许炳燮的牧师，从1976年起，在汉城市西北方的贫民区办起一所小教堂进行活动，我有机会跟他见了面。

许牧师平常主持礼拜、说教、圣经学习会等，还向60名教友解释有关生存权的问题。他和教友研究当今世上产生贫富之差的原因，并为提高生活，以贫民为主组建旨在相互辅助的基础公社。他还在政府的福

祉政策所达不到的这些地区，开办保育所、夜校等，为同居民接触和对话创造条件。他还教育居民认识到因自己无知、贫穷所受的欺侮和它的不合理性，并提醒人们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还教育人们，由社会意识较高的居民领头开展要求政府减免贫民儿童的学费、给贫民地区敷设电气、上下水道设施和开办医院、诊疗所的运动。

民众神学开始萌芽，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朴政权推行近代化政策，农业荒废，农民弃农离乡，流入城市，变为城市贫民，产生了贫民窟。政府却以美化城市为名，想把他们赶出城市去，于是这就变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从前，神学一般地囫囵吞枣地照搬西方的传统，说教也都流于形式。然而，深入到受苦受难的贫民群众中的年轻牧师们开始认识到，不管你怎么向他们解释道德，只能是一场空话，白费唇舌，而须首先改造社会经济体制。

自从1972年开始实行维新宪法，随之宗教也开始推进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73年的复活节撒了传单的人，被诬为犯有策划内乱的谋反罪，受了折磨。这件事，大大激怒了神学者，刺激教会领导班子改变看法，进一步巩固了民众神学的基础，这对政府来说，乃是适得其反。

从此，神学者们渐渐开始替贫民说话，维护他们的生存权。有的神学大学教授拥护贫民的呼声，发出

国际性的呼吁书，因而被监禁。许牧师说：“民众的主张和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使教会觉悟。教会给予民众的报答，便是民众神学。”

从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神学转向以被统治者为中心的神学，即民众神学，如今用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去研究圣经。今天，他们在贫民区盖上一座小小的教堂，以它为据点，将民众神学付诸于实践。在这一方面，这位许牧师是一位先驱者。

但是，在历来较为保守的南朝鲜基督教界持有这种民众神学观点的牧师只占2%。保守势力诽谤它是共产主义神学。在大学，讲授民众神学的教授，几乎都被撵出学校去。

许牧师曾对我说：“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时碰到令人苦恼的事。民众神学应该成为民众自己的东西，而不只属于神学者或牧师。我只是在努力贯彻这种观点。”

直到目前，民众，这个词的概念，在南朝鲜还不够明确，运用比较灵活。但是，根据在各个领域每每出现民众这个词的事实，令人不难推测，它好象在暗示南朝鲜的民主化运动应依据的立场。

许牧师说：“自古说，民心乃天意。”我想，他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老百姓的呼声乃是上帝的意旨。

（《世界》1988年第五期）

必须查究光州惨案真相

赵 德 圭

自从光州市民举行民众起义后，已过了8年岁月，而那令人震惊的证人的控告，到了现在才开始公布于世。

自1980年发生光州民众起义到今天的8年时间里，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一直在企图统统抹杀和掩盖光州流血惨案的真相。

然而，他们不但未能平息遭难的光州民众刻骨的怨恨，相反，却激起光州民众疾呼：要求查究光州惨案真相、否认"全斗焕政权"的正统性和追究美国的责任等。

于是，它就转变成广布于世的巨大舆论，就是在承继了全斗焕军事独裁体制的、以伪装"普通人"的卢泰愚作头目的"第六共和国"，即使披上"民主主义"的外衣推行"民主化"的情况下，还是要求通过查究光州惨案的过程，重新研讨"卢泰愚政权"的正统性，并面对面地把它加以否认。

各阶层要求查究光州惨案的舆论，主要主张先查究光州惨案真相，再以此阐明该惨案的性质，替光州

民众雪恨。

首先想举几个例子介绍这一舆论。

无党派议员朴灿钟说:

“光州悲剧是在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光州的恸哭声，如今还在持续。这一恸哭声反映了民族的悲哀，反历史性的悲剧。

“光州惨案之焦点，在于他们随意打死和刺死良民。用英文描写它就是brutal(野蛮)。借口维持秩序投入的军人肆意屠杀人，连逃难的孩子也未能幸免而被埋到望月洞墓地了，在这非战时期，竟发生了如此的惨案。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首先要发动国会国政调查权，查究光州惨案的真相。”

接着，他谈到了光州民众运动的正当性，他说:“光州抗争,并不是那种由于某个不纯分子的策划引起的暴动或骚乱,而是在全民渴望的民主化的岔路口上,由于军部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在全体市民的心田里开始萌动并发展成呐喊爆发的民众运动。”

和平民主党所属议员辛基夏说:“大家都知道，于1980年5月光州市民等许多国民举起的正义的火炬,是出自忧国衷情的民主义举。”并警告现政府说:如果“现政权”妄图把光州惨案“再次加以淡化、歪曲或掩盖,借此敷衍了事，逃避责任，那它必将遭到历史和民族的严正审判。”

宗教界人士明尽(开云寺住持)说,由于光州惨案,

对“第五共和国”的正统性令人生疑，同时诱发了“反美运动”，接着断言道：“要从根本上解决光州惨案，必须首先根除发生惨案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应实现人们流下那么多血所渴求的民主化，建立民族自主国家。”

五·一八光州惨案遗属会会长田桂良对光州民众抗争评论说：“对我们来说，五·一八是在这一国度的历史上发出灿烂光芒的民主、民族史运动的起点，同时又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人的良心和权力，反对不义，反抗独裁，进行忘我斗争的伟大的民众胜利的抗争史。”他接着号召查究光州惨案真相说：“在这个国度里，不能解决5月的光州问题的政权 ……自然不能取得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如不对光州民众抗争做出正当的评价，那么，即使它实现了民主化，也无法推进我们历史前进一步。”

其次，南朝鲜天主教农民会议指导神甫郑镐庚指出：“光州惨案是民主势力与军部独裁、民众与特权势力、民族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光州这块特定地区爆发而表面化，从而酿成的悲剧、创伤和怨恨。”

在“全斗焕政权”下，官方一味宣传说，光州惨案是“暴徒们引起的骚乱”，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如已经介绍，知识分子、言论界人士、宗教徒等许多在野的广大民主人士都认为那是承继了历来的反独裁民主化运动传统的“民众起义”。

“卢泰愚政权”的辅助机构——“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

去年(1987年)年底，在总统选举前后，要求查究光州惨案真相的呼声开始出现，随之，南朝鲜社会对此议论纷纭。结果，人们对卢泰愚提出强硬要求，及时查究光州惨案真相，追究其责任所在。这就等于研讨卢泰愚上台是否正当，进而查究“卢泰愚政权”的正统性。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在野党推选单一候选人运动的失败和滥用财权与官权的舞弊选举当选的“卢总统”，为了冲淡南朝鲜民众要求查究光州惨案真相的舆论，便施展诡计，组建了“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妄图借此平息国民积蓄已久的不满和要求。于是，在天花乱坠的喧嚣声中于1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的委员共有52名，其中除了极少部分，“委员的大部分由‘稳健’、‘保守’、‘中间派’的人士组成,给人以每每事起就露面的‘主顾’一样的印象”(《新东亚》第三期)。由此可见，“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无疑是为了推进卢泰愚的就任“总统”和“第六共和国”起步顺利，而炮制的辅助机构。

然而，事与愿违，与卢泰愚的企图适得其反，在

“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就光州惨案进行的讨论，倒给南朝鲜民众要求查明光州起义真相和追究责任的舆情火上加油，招致了意外的后果。

在“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里查究光州惨案的分组——国民和合分组委员会，于2月1日起开始了工作。这一天，为了正确地了解当时的光州局势，首先观看了当时摄制的三部录象片，《怨恨之地，光州在控诉》(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摄制)、《光州事件的经过》(日本基督教人韩国问题研究会紧急会议摄制）和《每逢5月的那天到来》(天主教光州教区正义和平委员会摄制)，随即“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的气氛大变，推翻执政一方的预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于是“民正党为之大惊失色，把过去1985年为自己的议员实行精神武装于中央政治研修院放映的胶片和这次给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委员放映的胶片的内容，做一次对比，认为没有多大出入，才放下了心。”(《月刊朝鲜》第三期)随之，自五·一八受伤者会副会长李光荣在会上的证言开始发表于世的2月3日起，国内外各家通讯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弄得卢泰愚的亲信和民正党都开始笼罩上了紧张气氛。(《月刊朝鲜》第三期)

《月刊朝鲜》(第三期)对于李某在座落于汉城市钟路区专卖厅别馆三楼举行的“国民和合分组委员会”参考人席上所作的证言内容，作了如下的报道。

“……李某作证，约经一个小时，然后忽然谈到

'当时空降部队和二十师的活动都是很隐密的'，接着说，他要公布最近由外国人手的绝密材料，用约三十分时间很快地朗读自从特战司令部第七空降旅于5月18日进驻光州起至27日凌晨结束全罗南道道厅上的镇压为止的军部的作战情况，弄得与会者都紧张起来。他作证时，一一提到当时的特战司令官郑镐溶(现任国防部长官)、空降旅旅长崔世昌(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二十师师长朴俊炳和许多现任前线各部队长(当时是校级军官)的名字，还谈到了这两个部队兵力的详细部署情况，他说得那么详尽好象偷听过军部核心的作战会议…… 李某在结束证言时说：'光州人根本不承认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我所以出面作证，为的是要转告光州的立场。'……然后激动地说：'你们自己也很难肯定自己不会变成民正党的走卒，岂能解决光州问题？'接着又说，'据说，政府和执政党已拟好总理发表的文稿，想借用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的名义来发表，以期对这个事件作出形式上的结论。就是现在也好，你们最好赶紧发表良心宣言，脱离委员会'。这样，他清楚地表明了光州方面对政府、执政党和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的严正立场。"

李光荣又在分组委员会就当时戒严军的行动作证说：

"起初，光州市民对走向街头的学生们只是观望，后来看到空降部队象打猪狗似地镇压学生，真叫人目

不忍睹，才打抱不平，开始奋起反抗。”“父母兄弟眼看他们拿枪打死人，学生们中弹流血死去，怎能不拿起武器呢！”他凭事实，控诉了镇压部队残无人道的杀戮罪行。

五·一八遗属会会长田桂良自问自答说：“在汉城、釜山、大邱等地都可以发生五·一八惨案，可是为什么偏偏在光州发生五·一八惨案了呢？”那是“因为要篡夺政权的军部势力选中了此地，而且此地有可称为媒介的金大中，认为最适于发动事变。”并主张说，军部势力制定详细周到的计划，制造了光州惨案。接着，他说，在美国的积极扶植下靠舞弊选举夺取政权的卢泰愚，为了擦去他自己做为杀人犯的血痕，正在挖空心思策划种种阴谋诡计，我们“反对他们趁民主化的气势高昂，混水摸鱼，玩弄各种把戏妄图冲淡或掩没杀人元凶的名字和他们犯下的罪行，必将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他这样向卢泰愚政权挑战。

这样，证人对光州起义的令人震惊的证言，非但未能平息了要求查究光州惨案真相的呼声，反而激起人们要求解除光州惨案留下的许多未解之谜的结果。随卢泰愚的就任总统，“民主和合推进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借此机会在查究光州惨案方面极其有力而宝贵的体验者的生动证词，通过南朝鲜言论出版界传播于民众。

因为篇幅有限，无法全部介绍他们的证词，但我

想尽力介绍一些证词，以澄清光州惨案的真相。

首先，我想按日期记下1980年光州惨案前夕和当时发生的主要事件，以回顾往事。

光州惨案日记

1980年4月14日。“国军保安司令部”(CIC)司令全斗焕就任自“一二·一二肃军政变”(1979年)后一直空缺下来的“南朝鲜中央情报部”(KCIA)代理部长，一手掌握了实权。崔圭夏发表声明，声称“对学生置时局的重要性于不顾，擅自进行阻碍国民团结的言行一事，甚感遗憾”；要求学生运动自制。

4月15日。学生对崔总统声明加以反驳；汉城大学等各大学一齐动了起来。

4月21日。东原煤矿7000多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展开静坐斗争。当局急派一个大队的空降部队去对付；逮捕100多人；工资纠纷遍及各地。

4月30日。全斗焕召集全军指挥官会议，在会上公布了“对于最近的社会混乱局势，决不能置之不顾，要从国家保安出发，采取坚决措施”的方针。戒严司令部司令李熹性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及“部分政治家利用学校做为政治宣传的场所，举行集会，进行扇动”；影射了金大中的活动。

5月1日。忠南大学、汉城成均馆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5月2日。在汉城大学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並通过决议，要求立即解除戒严令；对改订宪法表示抵制。成均馆大学、全北大学、全南大学等学校举行示威，要求解除戒严令；彻底清除维新残余分子。

5月3日。高丽大学、朝鲜大学等举行反政府示威。汉城大学学生宣布，“若不在14日以前解除紧急戒严令，15日上午将再次召开全体学生会，以更强有力的方法开展斗争。”从1日至4日共有7所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5万名。

5月7日。以尹谱善、金大中、咸锡宪等五人为共同议长的“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民联合”中央委员会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

5月12日。汉城大学等全国26所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发表声明：“我们反对当局把学生的活动当成社会动乱的态度，我们是在正常上课的条件下，用非暴力的、和平的方法展开活动的”。另一方面，当局自即日夜晚起，向首都汉城等全国主要城市的政府机关、报社、广播电台等公共机关派了戒严军。

5月13日。撤去了布置在汉城市里主要政府机关和报道机关周围的戒严军，但命令全国的警察：“即刻进入紧急执勤状态”。另一方面，汉城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表明停止执行5月3日发表的计划。但这一天夜里，

在汉城市中心的光华门附近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

5月14日。在汉城、大邱、全州、光州、釜山等地有34所大学的6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5月15日。全国60多所大学10多万名学生举行街头示威游行。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的学生提出“罢免全斗焕”、“辞退申铉确”等口号，展开了激烈的示威斗争。另一方面，申铉确发表特别谈话表明，“今后将根据局势发展，同国会紧密协商，适当地调节政治日程；并将能够提前的尽量提前，以满足国民的要求……至于戒严令，一旦局势趋于安定，就即刻解除。”

对此，汉城的33所大学代表举行集会，决定采取“注视政府今后的态度”的方针，除了部分地区，全部停止了示威。

5月17日。政府当局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从5月18日零时起把济州道除外的“紧急戒严令”改为“全国紧急戒严令”。与此同时，戒严司令部同时带走金大中和几十名民主人士与学生领导人、前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前总统警护室长朴钟圭等。

5月18日。戒严司令部公布“全国紧急戒严令”；按新的布告新增如下几条禁止事项：①以政治活动为目的的一切室内集会；②在非政治性集会上所做的带有政治性的发言；③脱离工作岗位的行动；④诽谤前任或现任国家元首的行为；⑤散布流言飞语等。同时，勒

令全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立即停课。

在光州，全南大学5000多学生集聚锦南路，举着“全斗焕、申铉确滚下台去！”的标语举行示威。戒严司令部则动员空降部队进行镇压。

5月19日。戒严司令部封闭国会和执政党与在野党办公楼，禁止一切政治活动。

在光州，继前一天，依然举行示威游行，9所大学的学生加上市民和高等学校约1000名学生汇合，参加示威人数达15000余名，他们高呼着“报纸和电视为何不报道真相！”占据了光州广播电台。

戒严司令部则出动空降部队一个旅约3000人进行武力镇压。

5月20日。反政府示威的参加者增至约10万名，部分队伍占据了全罗南道道厅办公楼、光州车站和银行；几十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汇合到示威行列中；他们不顾宵禁（从下午九点至第二天上午四点）依然展开斗争。

同一天，申铉确内阁由于招致骚乱全体提出辞呈。

5月21日。光州的示威，发展成同戒严军的巷战。据传，参加示威的群众多达20万，有的说达30万，总而言之，不分男女老少都奋起参加了斗争。

戒严当局则再投入数达1000名的空降部队和由汉城调至光州的两个旅的兵力；在道厅办公楼前群众与军队对垒；军队向群众乱放枪。群众由于忍无可忍，砸

开了市区和郊区的警察署、乡土预备军的火药库，夺取几千支枪支和弹药、炸药，还从工厂夺取了装甲车、吉普车和军用卡车武装自己，高呼着“刺杀全斗焕！”同军队展开了激战。

5月22日。市区不见一个军队，很平静。有10万名群众在道厅办公楼前举行集会。

据当局发表的材料，截止今日，全罗南道的16个市、郡都风起云涌地进行反政府示威游行。另一方面，戒严司令部公布了对金大中的审讯简报。简报称，金大中“扇动学生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计划掀起民众起义，颠覆政府。”

5月23日。在道厅办公楼前，5000名群众在被害者的遗体前表示决心，誓死抗战；市区里举行示威游行。

5月24日。戒严军开始动用重武器；压缩对光州市的包围圈。市民群众垒上街垒对抗；发生零星的枪击战。30000名市民在道厅办公楼前举行对全斗焕纸人的火刑。

美国派航空母舰“考拉西”号驰往朝鲜近海。

5月25日。戒严司令部发表警告文，暗示要强行武力镇压；增派10000名空降部队。

崔圭夏坐直升机视察光州；在军队打进光州之前发表“最后通牒”。

5月26日。戒严军突进市区；市民则因为他们“违

反约定"起来反抗，准备抗战。

另一方面，全道民收拾对策委员会派代表到市郊的戒严军地区司令部进行交涉。

5月27日。戒严军投入约达25000人的特种伞兵部队和陆军正规部队，从地上和空中突进光州市强行武力镇压；军队攻击市民军占据的道厅前广场，双方展开激战。至上午7点，戒严军完全封锁光州市。

5月31日。戒严司令部发表说明光州惨案全貌的详报。他们借口在这次事件中起领导作用的学生和律师事先与金大中有过接触，把金大中指控为"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6月1日。美国总统卡特就南朝鲜政府为镇压反政府运动施用强硬手法一事说："显然民主化有点倒退"，但他却坚决主张"反共保安为首要任务"，并表明"美国对韩政策，不会有变更"。

下面我想转载发表于《月刊朝鲜》(第三期)上的光州惨案目睹者们的证言，以便重温一下这次惨案之全貌。

通过证言透视光州民众起义

朴孝诚(当时全道民收拾对策委员会公报部长)的证言：

这件事发生在不是19日就是20日，当时群众已退到终点站附近。

在MBC广播电台起火之前，已有一辆轿车起火烧掉，那时有一个青年倒在车前，身上还插着刺刀。

……从道厅前喷水台方向响起枪声，接着跟随示威群众来到这里的一个中学生叫了一声“哎唷！”就倒了下去。

……被棍棒击中头部和肩部的人接连倒下去，他们向车上的人挥舞枪托乱打。被追的群众向四方逃散，来不及逃避的则挨了棍棒或被抓住。他们逼人跪下后，用军靴乱踢他们的膝盖或用硬木棍乱打。

尹锡累（当时市民军机动打击队长）的证言：

凌晨四点左右（26日）军队事先没做任何警告便乱放枪炮，并使用火焰喷射器突进了道厅办公楼。

我在副知事办公室被军人抓住。

……我在该办公室房门前看到几具被火焰喷射器烧死的人的尸体。

金正培（当时朝鲜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证言：

当时，我刚从军队复员，复学后在朝鲜大学农科大学（三年级）读书，对学生运动不甚关心，那么，我为何参加了占据道厅办公楼的那一组呢？那是因为我见21日下午发生的令人愤慨的事件大受刺激的缘故。21日下午，戒严军在道厅办公楼前突然打起排枪时，我正站在天主教中心附近。我起初以为他们在放空枪唬

人，但仔细一看，到处有人倒了下去。当时，我又惊愕又愤慨，心想怎么还有这种事，军队竟向人们开枪……

有一个上身穿制服下身穿白运动裤的女高生从我身边走过去，忽然有颗枪弹飞来击倒了她。我一时弄不清子弹从何处飞来，呆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扶起女生一看，她已咽了气。那一天晚间，我终于拿起枪杆参加了同戒严军的战斗。

那天(22日)下午，我们把分散在各家医院的尸体全部运到道厅前面，共有五十具……当时，我任殡葬委员会委员长，我把尸体入殓后，让探问亲属生死的市民，一个一个来认尸，查明死者身分后出殡掩埋。那时最感棘手的是受害者太多，棺木不够用。

郑永浩(当时全南大学学生)的证言：

1980年我是全南大学学生，是全南大学刊物编印组成员。

5月18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编印好反对五·一七紧急戒严令扩至全国和戒严军进驻光州的各种刊物，乘坐出租汽车驶往道厅。我们驶到终点站附近……见到路上有多处血迹，许多人在用抹布擦拭。

路上的妇女们一见我们这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瞎逛！赶快离开这里吧。"据她们说，半小时前，空降部队在这里，碰上学生就狠命地打……

我们便走进邻近的商店察看外面的动静，在三点半左右有三辆军用卡车驰过。车箱角上有个军人持枪押送，车箱里有许多人跪着或趴着。

MBC广播电台在起火燃烧，戒严军在正祥学校前布阵待命……。在正祥学校前，有一辆戒严军的装甲车，在戒严军与市民对垒的中间地带快速驰来驰去。20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有一个小学男生因躲避不及，被装甲车撞死在地上……

5月21日，我听说光州税务所地下室里有一具女尸，便跑到那里一看，人们正在抬着女尸走了出来。

当我的视线触到女尸时，不觉侧转了脸。她全身刀伤纵横，残不忍睹。她的脸被乱刀砍剁的已难辨认出本来的面目。

李梁贤(当时学生斗争委员会企划委员)的证言：

5月19日下午两点到三点，空降部队的车用一条长绳象串干明太鱼那样串绑着七八个年轻人向锦南路拉去。那些青年的身上只穿着衬衣。

因为车开的时快时慢，被拉的人不时倒地起不来，或者倒在地上被车拖去。就是在时隔几年的今天，我还是不愿意回想当时见到的惨状。下午五点，双方在锦南路对垒，不时发生冲突时，警察则在无等补习学校前布阵，排坐在地上阻止示威队伍前进……这时，有6个空降部队军人，在无等补习学校前的大街上，追赶示威群众，我看到一个军人从后面用棍棒打倒了一位

并非学生的妇女。

……军人闯进无等补习学校，挥动棍棒见年轻人就打，有两个妇女被他们抓住扒掉衣服，逼着跪在地上。

21日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两万多市民向道厅前锦南路上的第一大厦集拢。

军队警告他们说，你们如果再前进一步就开枪。

军队在道厅办公楼前布阵阻止示威民众。这时，从示威队伍里有一辆车子钻出来，围着喷水台转了一圈。

人们一见，便高喊着“他们不敢放枪啦！不放枪啦！”一窝蜂地向前涌去。军队开枪了，有三个市民中弹倒下。

当时集聚在那里的，几乎都是中学生和老人，没有一个大学生。

郑海直(33岁，教员)的证言：

5月19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军队由东北方开始进攻，枪上都上了刺刀。他们把逮住的三名青年扒光上身，排在前面做挡箭牌，一步步向前进……

那时有几百名群众云集在防寨边，他们想“军队哪能真地来刺杀我们”，只站在那里观看。可是，军队一走到群众面前，便用枪乱刺，就象在练刺杀动作一样。很多人被刺倒了。

21日上午八点……整个市区变成了战场。

下午六点，我再次来到锦南路。听人们说，刚才

有一个指挥示威游行队伍的人中弹牺牲。人们已经散去了，但锦南路仍无法通过。

那时，中学生也已经拿起了枪杆。

金廖俊(前全南日报编辑局长)的证言：

他们专寻年轻人，狠打他们的头。我在光州住了几十年，所以市内的年轻人我几乎都认识。这些青年，大都是在食堂当厨师，或在理发馆做事的。军队打人有顺序，大致先打后脑勺，接着打小肚子、后背、膝盖，然后叫人跪地。这是军队式的治人法。

19日上午，这事发生在锦南路东区厅前。有一个年轻女人从基督教青年会馆向无等补习学校走去。军人从后面追上她，用棍棒乱打起来。送那个女人的年纪四十多岁的大嫂劝军人不要打人，他们就扑过来连大嫂一起打。刚下课走出来的无等补习学校的学生见了不觉“哇！哇！”喊了几声，军人听到喊声又向他们扑过去，挥动棍棒乱打，并逮去了几个学生。另外一些学生又“哇，哇！”地喊，军人追赶他们，闯进了教室，接着就听见里面传出哀叫声。

21日，我看见在商工会议所前面的第一银行边，一名打着太极旗乘坐装甲车向道厅驰过来的穿着训练服的学生(大概是高等学校学生)忽然中弹，从车上摔下来。

禹东辰(假名，当时在光州采访的记者)的证言：

5月18日下午六点后，戒严军到各家旅馆搜查，一

见旅馆的服务员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施加暴行。闯进市区的戒严军，勒令正在运行的公共汽车停住，把乘客中的年轻人拉下车就打。

金润基(假名，当时在光州采访的记者)的证言：

18日下午四点左右，我登上座落在光南路十字路边的一座楼房的广告塔，用相机拍摄在街上展开的示威情况。……军人用棍棒和枪托乱打人，广告塔底下的屋顶上也展开了搏斗，军人用象球棒一样的棍棒乱打人，不管是头还是肩，上去就是一棒。头被棍棒击中，就从伤口喷出鲜血，我把这些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过一会儿，我走下了广告塔。楼梯上全是血，血就象用水桶倒在地上，一直流到底层。

田桂良(死难者遗属会会长)的证言：

22日，我去了前一天没去成的基督教医院。我不顾警备员的阻止，走进了医院的停尸室。走进里面一看，分明我儿子(高等学校三年级生)躺在那里。我在给尸体消毒时，看见儿子被子弹打穿了太阳穴。

朴福南(死难者遗属)的证言：

下午一点左右，外面响起了枪声。……过一会儿，我听见有人喊，一个在游水的孩子被打死了。可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儿子会被打死。然而，分明有人告诉我说，死去的正是我儿子(中学一年级)。我惊呆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叫孩子他爹去看个究竟，他回来说，孩子只穿着衬衣，头部中弹死去。

文贡阳(遗属)的证言:

25日，我儿子蔡学给家里打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上说:“我有个朋友已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只顾自己平安无事啊。如果有军人来，我会躲开的，请您不要挂念。”……后来，我通过军部才探知有一具身穿训练服的年纪大约17岁的高等学校学生模样的尸体，无人认领。据他们说，这具尸体的秘密号码为413、坟墓号码为104、棺材号码为94……6月9日，我到坟地掘了墓……看样子他是从背后挨了一枪，被打穿胸部致死的。

朴顺礼(遗属)的证言:

从23日起我儿子泰焕就没有给家捎信来。他的朋友们到家里来说，前些日子军队在池元洞向公共汽车乱放排枪，有好多乘客被打死打伤……通过当警察的朋友周警长打听到我儿子被打死……到检察厅看了验尸的照片后，掘墓验尸，看见他脸的下半截给打飞了，胸部被打穿了一个洞。

权根南(遗属)的证言:

我家五户同住一个院(光州市松岩洞58～2)，24日上午9点左右，突然遭到军队的扫射。……过一会儿，枪声一停，他们就闯进院里挨家搜查。他们在厨房发现了我哥哥和金承勋(当时18岁，工人)、任炳哲(26岁)，把他们抓走了……他们把我哥哥和金承勋打死了，我哥哥的尸体被投进离我家不远的一个下水道的脏水口

里，哥哥的胸口被子弹打穿，双臂上有枪刺的伤痕。任炳哲的尸体，在对面山麓发现。

李光容(33岁，光州受伤人会总务)的证言：

21日，突然有很多伤员被送进医院，一片混乱。我……想开展红十字救护活动，向市民一号召，就有几十名响应……在光州车站有三名青年同时中弹倒下，我们把他们抬到车上的时候，其中两名咽了气。有一个高等学校女生要为伤员献血，我们就让她上车，把她带到基督教医院去。过了几个小时后，有一辆车把一具女尸装在车上运来，我一看，正是刚才要求献血和我们同车到医院的那个女学生。

……我因为看到的死伤者太多，神经几乎麻木，不怕枪击，死亡都不在乎了……在徐氏妇科医院前，有两个人中弹倒在地上，鲜血直流。我们不禁有些不安，但因为我们的车上标有红十字，便大着胆子驾车向负伤者驶去。驶到离伤者20～30米远时，"砰"地一声枪响……坐在后座上的一个青年……右肩被打穿……我们倒车，拐进一条胡同驶到大街上，把车转向示威群众后下车跑去，把伤者一个一个地抬到车上。当我和另外两个人又跑去抬来剩下的一个伤者，要把他弄上车的时候，军队向我们打来了连发集中扫射。我霎时感到脊椎剧痛面向车倒下去。司机立即跳下来把我拖上车，快速驾车逃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坐在车后座上的三位同事因中弹当场身死。

郑在熙(44岁，受伤者)的证言：

我家住光州市芳林洞125～2,21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道厅办公楼前的劳动厅办公室附近中弹受伤。当时，我开一所照相馆，拿着照相机夹在群众里观看示威。可能是这个照相机,使我成了他们射击的目标……

我腰上被枪弹击中倒了下来，站在我身边的无等中学三年级生洪斗杓也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

我怎么也不明白，我们根本没有参加示威，只是站在一边观看，为什么要开枪打我们。

南东成(假名，当时战斗警察官)的证言：

20日,我看见空降部队扫荡着走过的对面路上,有两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的人倒在地上,急忙跑过去一看,其中一个人已咽气，看样子被军鞋踩了胸部。另一学生奄奄一息，呻吟着叫"妈妈、妈妈！"没过几分钟也死去了。

汽油供应站前的马路上,有两个青年倒在血泊里。其中一个已死去，另一个也奄奄一息……对于空降部队的暴行，我还亲眼目睹过如下事实。记不清是18日还是19日了，总之那一天，有一位大娘见军人在锦南路附近群殴大学生，便上去拉军人别打人，军人竟挥动镇压棒向大娘砸去,大娘当场就倒在地上不动了。空降部队用的镇压棒，长70公分，棒头粗，握柄细，很象球棒。21日下午一点……有一辆公共汽车向空降部队驰去，坐着示威游行的人……这时，一个军官从

腰上拔出手枪，照司机开了枪。不知司机是因为中弹还是别有什么，汽车在喷水台边转了两圈停了下来，空降部队便在离车有十米处向汽车狠劲扫了一阵。

金相辑(全南大学学生)的证言：

19日早晨，在终点站附近的厕所里发现了两具男女学生的尸体。有3000到4000名的示威游行队伍被赶散，警察驱车追赶人群，大约有12辆空降部队的车辆也去追人，军人用枪刺乱刺群众。

金某(当时高等学校教员)的证言：

21日晚，我去金仲喜先生家吊唁。金仲喜先生的夫人崔美娜，怀孕8个月，被乱枪击中丧命……据说，夫人是因丈夫没有按时回家，为丈夫担心，在家门前等他回来时，不幸被军队击中脸部当场丧命的。尸体的脸部被打得血肉模糊。

金某(市民)的证言：

我向韩一银行方向走去时，见乡下人模样的一位妇人领着象中学生那么大的儿子向军队布阵的方向走过去……有个军人，见这母子向自己走来。便拿棍棒向男孩劈头打去。母亲赶忙护住儿子，军人就手给了她的头一棒。真是触目惊心。比起我刚才见到的用刺刀刺年轻人更惨，令人目不忍睹。

安圣礼(基督教医院护士长)的证言：

5月21日是光州惨案中死伤人最多的一天。这一天，正值“耶稣来临之日”，我们基督教医院本应公休，

但因伤员太多，全院人员照常上班，我看这是上帝赐于我们的奇迹……我院本有350个床位，几乎已占满了，可是这一天，又送来了137名伤员，都是被刺伤、打伤或被子弹打伤的……刚在我院抽血献给伤员的朴君姬（当时高等学校三年级女生），没过多久，被枪弹击中，变成尸体被运了回来。这不过是当天发生的许许多多悲剧中的一则而已。那一天，我开始对人的本性产生怀疑。一个人竟能犯下这样的罪行，我实在想不通。有的伤员被刺刀刺穿下巴颏，形成一个大洞。甚至刚从军队复员几个月的军官出身的金永泰（34岁，光州市北区云岩洞479～1），见到这般惨状也忍无可忍，终于高呼一声"我们也要和他们拼"，跑去参加示威游行队伍，结果在锦南路中弹倒地。事态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就不难想象空降部队的镇压暴行达到何种程度。

光州惨案的背景，美国的责任所在

根据前面众人令人激愤的证词，可以断言，光州惨案是国军向本国民众挥舞刀枪、开枪打人的反民众的、反民族的暴行；同时也是光州民众一致奋起反抗这一暴行的爱国爱民族的民主、民众起义。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当局却一手掩盖和歪曲了光州惨案真相。

今年4月1日，政府就光州惨案做了模棱两可的评

语，说这是“为民主化而做的努力的一个环节”，并假装采取措施向国民“谢罪”，许诺给遗属和受伤人以抚恤等，妄图永远把光州惨案真相置于迷雾之中。

对此，光州惨案的受害者田桂良说：“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是出于卑劣意图的。他们企图用物质上的补偿来冲淡他们在光州惨案中犯下的前所未闻的罪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非由新国会组成一个真相调查团，对光州惨案的根本原因和死伤人数、当时的传闻，都一一加以彻底查究，别无他法”，并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卢泰愚政权”妄图掩盖光州惨案真相而做的阴谋活动。

在查究光州惨案真相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向国民公开发生惨案的背景。

对于光州惨案发生的背景，如政府当局已在《光州事态真相》（1985年7月30日，国防部印发）、尹诚敏国防部长官向国会提出的报告（1985年6月7日）和1980年5月31日发生光州惨案后由戒严司令部发表的《光州事态》等文件中明白表明，他们认为，其背景在于学园闹起的骚动。

当局认为，学园闹起的骚动是招致惨案的开端，是由在背后操纵这种骚动的部分政治势力的活动所致。

但是，事实真相已通过光州证人的证词大白于世，毋庸赘言，光州惨案是起因于军队的凶残暴行。“建立五·一八光州民众革命牺牲者慰灵塔和纪念工作泛

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发表声明，驳斥了国防部长官尹某的报告。

“十·二六事态以后掀起的民主化趋势热火朝天，随即转变成全体国民一致的意愿，要求尽快建立民主政府，摆脱维新独裁的泥坑，建设民主化的祖国。为此，首先必须废除毫无根据的戒严令，争取名副其实的言论自由。

“……自1980年5月14日至16日的三天里，全南大学、朝鲜大学和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以光州的全罗南道道厅办公楼前广场为中心，开展和平的、理智的示威游行，提出了他们的即全体国民的要求。……到了星期六即5月17日，各大学都平静无事，正常上课，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他们却被狂妄自大的掌权欲望所驱使，竟在5月17日凌晨，施展骗人的伎俩，错误地毫无根据地扩大戒严令适用范围，并随即封锁大学，大量逮走民主人士……

“他们17日采取的措施，虽于18日早晨传播开，但正值是星期天，大多数大学生不理这些都在家里休息。只有对局势的发展不大敏感、专心读书的全南大学的部分学究派学生，想利用这个星期天到大学图书馆阅读，不顾空降部队把守，走近大学正门。

“空降部队对只为学习而走近学校的学生，干下了什么样的暴行呢？他们对来校学习的学生，见人便抓，扒掉衣服，拿枪托乱砸，犯下了凶狠残暴的屠杀暴

行……这些事实传开后，于18日上午在全南大学正门发生的学生示威，正是光州抗争的开端”(6月7日国防部长官提出的报告中所述并非光州惨案的真相，而纯系捏造的谎言)(摘自《新东亚》第三期)

声明驳斥国防部所指的“部分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这一说法说：“那些部分政治势力中究竟是谁操纵了光州市民，又有哪些不纯分子进行活动，你们已将那么多人投了狱，又那么仔细地搜查过，难道还没有查出该当不纯分子惩罚的那些人！人们还记得，当时戒严当局派密探潜入道厅办公楼，妄图把光州五月革命弄成是不纯分子活动所致，而爱国学生及时揭发和逮住了那些密探移交给戒严当局。事实既然如此，你们还敢胡言乱语！”

在这里谈到的密探事件，是指当时称为“毒针事件”的怪事。当时流传说，有一个市民军在道厅办公楼，被“不纯分子”的毒针刺害。这事件，本是一个事件的肇事者——两名戒严军所挑起的，已通过曹哲铉、金正培等两个证人在《月刊朝鲜》第三期上发表的证词所证明。

另外，被当局诬为背后操纵的主谋者的金大中发表了题为《光州起义真相》的声明(1987年12月14日)，声明中说：

“通过一二·一二军事政变掌握了军部实权的全斗焕、卢泰愚、郑镐溶、李熹性、黄永时等人，为了

用武力篡夺政权，于1980年5月14日在陆军本部密谋，于5月17日宣布扩大紧急戒严令适用范围，逮捕金大中，由于这些措施必将引起的光州市民的抗议示威，他们决定借鉴处理釜山、马山事件的办法，坚决予以镇压。根据这个计划，军事政权事先派两个空降大队到光州，当5月18日光州学生和市民举行和平示威时，挥动棍棒、刺刀和短剑，凶狠残暴、惨无人道地对民众打、刺、砍，杀伤了许多人，酿成惨案。"

当时在光州附近任某师师长的郑雄的证言，给金大中的声明提供了更可靠的根据。他说：

"那时，军部给我下命令，叫我5月16日之前占领光州市的十所大学、两所报社及两所广播电台，并从5月17日起将约1000人的空降部队投入作战。于是，我派本师的500名士兵占领了军部所指的那些机关和设施，另向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各派500名空降部队把守……

"我想在这里应附带地说清一件事，一二·一二军事政变主谋者们策划，先逮捕金大中，以刺激光州学生，导向示威游行，闹出'光州事态'，然后借口社会不安定，向国民显示军部干预政治为正当的事，进而摘掉至今他们所戴的假面具，出头露脸，这就是他们这次所用的具体方案……

"对于这一点，仅据光州惨案过后仅有四天的5月31日就出现称为保卫国家立法委员会这样大名堂的权

力机构一事，就可以证明。”

通过前面的证言，光州惨案真相已大白于世，它是纯系“一二·一二军事政变”的主角们，为掌握政权挑起的大屠杀案。

就光州惨案而言，除了上述几项问题之外，还留有许多待查明的事项，如：流言飞语问题；有的说数达1000人，有的说2000人的死伤人数问题，等等。特别是，对握有南朝鲜军统帅权的美国，无论如何也该追究其责任，弄清其责任所在。

对于这一点，李祥雨在《新东亚》第二期刊载文章指出：

“美国站在南朝鲜掌权势力一边，为镇压光州抗争大卖力气的、最可恶的行动，便是同意南朝鲜当局动用兵力去镇压。5月22日，正当为空降特战队惨不忍睹的暴行激怒的市民自动奋起，拿起武器组成市民军，把戒严军击退到市郊，光州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兼韩美联合军司令威卡姆上将同驻韩大使克雷斯廷协商，决定接受南朝鲜戒严当局的请求，允许属于自己作战指挥权的部分南朝鲜军兵力转移到光州地区。这股军队，就是属于第二十师的四个团。”

美国为光州惨案做帮凶一事，已被揭露无遗了。毋庸赘言，对于美国应负的责任，今后应在公开的场所公开地进行追查，不然，南朝鲜民众要求追究美国的

责任的舆论，必将日趋高涨，到头来招致进一步加深反美情绪的结果。

白基琓所说的“光州的怨恨，决不可能用几文钱来加以补偿。只有在为解放和统一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再生，才能雪恨。事实上，‘光州’要从现在开始。”(《新东亚》第二期)这句话，是语意深重的。

卢泰愚应该明白，在本质上承继反民主、反民众、反民族的军事独裁的虚伪政权下，光州的怨恨永远不会消散，它必将日益增强，直到独裁政权崩溃为止。

(《统一评论》，1988年第五期)

再论南朝鲜当局所说的“南北对话论”

——关于破坏对话的逻辑

康　德　珠

南北分裂和建立单独政府之后，南朝鲜的历届政权一直在声称，统一才是民族至高无上的任务，而实际上不许人们干预这个问题，而由他们独揽了统一问题。民众要求国家统一的运动，一向被他们指控为“体制颠覆阴谋”而惨遭镇压。

他们把反共思想当做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从而把统一问题直接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连系起来，把它变成只由政府处理的问题，不允许别人来过问。

基督教长老会的金敬宰说，冷战的逻辑和反共思想的绝对化，逼人无条件地接受“国家保安”、“社会安全与秩序”、“国民总和”与“国民和合”等等，他们从而得以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的镇压。（金浩镇《剖析在野及学园街的“民众统一论”》，《新东亚》1988年第九期）不言而喻，直到今天，这种现实一直在严重地压制着统一运动。

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即使处于这种情况，民众还是一直在推进统一运

动，并且通过探索以民众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的过程，如今发展到提出更加实际的而又具体的目标，开始要求实现联邦制统一方案了。至今差不多是基于伤感的或感情出发，主张必须统一，而通过这一运动，它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当统一运动开始在民众运动的中心深深扎下根的时候，南北当局的对话又要触礁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研讨一下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政策，总不会是无谓的事。在世界范围，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的潮流汹涌澎湃，不能以人力逆转，加之实现统一的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我认为，这一现实，正在要求对他们的统一政策再做一次研讨。

独霸统一议论及“窗口一元化”

“卢泰愚政权”至今从未提出过象样的统一政策。去年7月7日，他虽发表过所谓的“关于南北关系的特别宣言”，而它也只是有限地谈到了改变当前南北关系问题（又有很大局限性），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提出统一政策。

我认为，与其谈这些，更应该首先透视提出七·七宣言的背景，弄清卢政权对统一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对于这个态度，“窗口一元化”政策暴露的明明白白。由于民众的统一运动远远超过卢政权的意图，快

速向前发展，使他们为之震惊而急忙抛出的，正是这个“窗口一元化”。现在就具体地剖析一下这个政策。

卢政权的基础本来就很脆弱，它的根本缺陷，是竞选时只获得36.6%的赞成票，而且缺乏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利用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潮流，顺水推舟，不能不抛出政府主导的“北方政策”和“统一政策”这两张牌来做武器，把自己装扮成正统的。1988年4月21日“卢总统”所以提出南北首脑会谈问题，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另外，对于有关北方资料的公开、扩大统一议论、组成并巩固中间层主导的“统一主体势力”、建立同北方的新的关系等问题，统一院也正在拟订新的方案(统一院长官的工作报告，1988年3月15日)。

然而，学生们为争取南北共同举办奥运会和实现南北学生会谈开展的运动，却与当局的意图背道而驰，快速扩大和发展成为统一议论和统一运动。于是“韩国政府”急忙出面声称“禁止无谓的统一议论”(李种南检察总长，1988年6月3日)，并抛出了限制开放统一议论和对北接触窗口一元化政策。美国国务院于6月9日对此发表评论，全力支持了“窗口一元化”政策。

这些作法令人不禁认为七·七宣言是为了让人们领会“窗口一元化”政策而急忙抛出来的。对于七·七宣言还有这种看法：“这个宣言，看样子在国内也带有一定的背景……做为一个政府，当然有必要全部接受

‘民众一方’的统一议论，重新制定政府级的统一议论”。（《东亚日报》1988年7月8日）

七·七宣言中看不到统一的前景，当然没有一笔描绘统一国家的蓝图。

说是为了“国论的统一”和“防止社会混乱”，要实行“窗口一元化”，而其根本原因则出于反共、反北思想，这一点是决不可忽略的。这正是历届独裁政权当做金科玉律的东西。尤其是朴正熙，把它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赤化威胁”、“维持公共安宁和秩序”等等，并又给它加了一条“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保安”、“对抗”、“增长”等等都成为“国论”了。至于对统一问题，他只提了“实力培养论”和“先建设、后统一”的论调。

除了这些，其余的一切统一议论，都诬为“容共”、“左倾”和“颠覆体制”阴谋，成了镇压的对象。还有，尽管朴正熙在1972年签署了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但在1973年却发表了以“同时加入联合国”和北方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六·二三宣言，公然抛出了“两个朝鲜”政策。

这个“两个朝鲜”政策，从朴正熙毙命经崔圭夏政权，通过1979年的一二·一二肃军政变和1980年的五·一七政变沿袭到“全斗焕政权”。继承了“朴政权”遗产的“全斗焕政权”，如出一辙独霸了统一议论，若有人表示反对，就把他诬为“容共、左倾”分子，加以镇压。

现今的“卢政权”也持同样态度，假如说有所差别，那就是妄图用“窗口一元化”来横挡民众的统一议论，防止运动扩大，除此而外，其余毫无变化，如对待对话的姿态和逻辑依然如故，仍在重蹈“朴政权”抛出的，“对话逻辑”的复辙。

要想争取统一，对话是必经之路，不论是政府级的对话，还是民众级的对话都需要，其中无论缺了哪一个，都必会在走向统一的路上有一定的障碍。

只有这两路对话进展得卓有成效，才能使统一问题成为全民族的任务，按照全民族要求统一的一致意愿，顺利地得到解决。

要使对话真正为统一有所贡献，首先应该站在要求统一的立场上对待对话。尤其是不应该限制统一议论，不要由执政者来独霸，而要允许人人都来参加。

但是，研讨至今的对话情况，南朝鲜当局对待对话的态度，不象是要求对话，倒象是追求对抗，统一议论曾大受限制。这种情况，自从开始南北对话的“朴正熙政权”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老实说，自从1972年发表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之后，“朴政权”就强调说，南北对抗在思想上“已由理念上的对抗转变为现实的对抗”，在军事上“由战争前夕之对抗转变为潜在的对抗”，在政治上“由阴性对抗转变为阳性对抗”，在社会文化上“由抽象的对抗转变为具体的对抗”，在外交上“由局部的对抗转变为全面

的对抗”(《国土统一》1974年第二期)。一句话，宣布了由“没有对话的对抗”转移为“有对话的对抗”。

换句话说，他们把对话，利用于政治对抗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方面，现今的“卢政权”也无所改变。

机能主义，阶段统一论

北和南开始对话，已有十七年；通过各个渠道的接触和对话，已进行过一百多次，然而，实际上得到实现的只有两项：一项是1984年北方提供给南方的灾民的援助物资；另一项便是1985年在红十字会主持下进行的交流，即艺术团的互访和部分离散家属之会面。

毋庸赘言，其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北双方对待对话的姿态，相差悬殊。尤其是南朝鲜当局所持的姿态，是与以统一为宗旨的对话格格不入的。至今的所作所为，给人如实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就在于南朝鲜当局所奉行的“统一政策”。历届政府的统一方案中，可以说略具形式的，就算是全斗焕于1982年1月通过“施政演说”发表的所谓“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可谓这方案之要点的是关于“南北之间基本关系的暂定协定”案，他们扬言，这是南朝鲜方面首次提出的具体统一政策。“卢政权”也沿袭着这一政策。细究这个统一政策的逻辑结构，它基于国际

政治学上的机能主义的合并论和实用主义的阶段论。这早已反映在“朴正熙政权”所奉行的统一政策之中。

1970年夏，在由南朝鲜主办举行的讨论会上，他们就南北统一问题提出的主张是，①应按机能的、有阶段的接近方法取得解决；②同时加入联合国，便是唯一现实的途径；③和平共处阶段必不可缺，等等。

就机能主义合并论而言，那是因为各不相同的主权国家一下子从政治上接近实现合并维持和平较困难，所以要靠较现实而牢靠的方法实行，就是首先从非政治领域即经济、文化、人道主义等领域建立国际的合作体制，以期维持和平。这个理论，是以下列两种观点为前提的。其一，认为，互不相同的社会之间，一旦发生相互作用，就会产生相互依赖关系，它将给双方带来共同的“合并利益”，同时给双方造成不可分离的关系，促进合并。其二，认为，在某一领域上的机能的合作关系，必将为实现其他领域的机能的合作关系以很大的影响。

南朝鲜当局照搬这个理论，套在统一问题上，并把它加以具体化，提出了阶段论。所谓阶段论，顾名思义，就是说，要想统一，须经历时较长的各个阶段。这是把统一事业描绘成渺茫无着的东西，并为“论证”不可能实现政治统一而施展的伎俩。

南朝鲜当局甚至把统一这个词的概念都加以歪曲。例如，他们硬造出“广义上的统一”这一概念，主张统

一有两种，一个是“政治统一”，另一个是“机能统一”。前者是“只能做为目标的统一”或“应该达到的统一”，而后者是“做为一个过程的统一”或 “能够实现的统一”。结果，把后者即“机能统一”当成应实现的目标了。

前国土统一院长官慎道晟反映当局的观点说：“在目前，我们该实现的和能够实现的统一的目标，正是积极努力推进这种机能融合”“……很明显，要达到最终的统一，中间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中间阶段。”（《韩国统一的理念和现实》）换句话说，这样，把统一问题，偷偷地改成了非政治的交流问题。

在这“相当长时间的中间阶段”，要实现机能融合，这正是阶段论的实质。曾任朴正熙政权的统一院长官的李圭学把这个中间阶段曾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政府正把统一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加以推进。第一阶段是把和平固定下来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恢复民族同质性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南北举行普选建立统一政府的阶段”（1974年2月12日）。按他的说法，要实现统一，须经固定和平、实现非政治性交流、实现政治交流等三个阶段。人们乍听起这个说法，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是解决复杂的统一问题的切实可行的 “现实”途径。

也有人认为要解决双方之利害关系表现得最尖锐的政治问题是较难下手的，那就不如首先着手解决较容易处理的非政治问题。

那么，统一问题是能够用这种方法去解决的吗？事实却不然。在这里所说的实现非政治性交流的阶段，就与“机能统一”阶段即“能够实现的统一”阶段相等，这就意味着使统一事业停留于前已论述的“该实现的而且能够实现的统一”上。这样，达到这个阶段，统一事业势必告终，而不能再向前发展。显而易见，这是他们执意要固定分裂状态的。

政治学家李昊宰教授就当局所采取的这一姿态，向民众敲警钟说：当局在硬逼人们“摆脱只谈‘完全分裂’或‘完全统一’的死板的思考方式，立即采取灵活的态度去承认改善了的分裂状态大大胜过必将招致混乱的统一。”（《韩国外交政策的理想和现实》）

当局把统一看成是“混乱”，无可争辩，他们的这种看法实有问题。同时我们不该忽略，他们力图用“改善了的分裂”这一词来掩盖力求永久分裂的反民族的勾当。还有，应该记住，这个“改善了的分裂”，就是“机能统一”和“能够实现的统一”的基本内容。

对南北对话，当局所以持力求对抗的姿态，是因为他们是立足于上述的“统一政策”的。事实上，南朝鲜当局至今一直力图把南北对话局限于非政治问题，因而南北对话从没有取得成就。

例如，七·四南北联合声明发表后过了一年，朴正熙于1973年6月23日发表了“和平统一外交特别宣言”，第二年（1974年）8月15日发表了“统一三原则”。

由七个项目组成的六·二三宣言，以1，互不干涉内政；2，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3，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门户(北方政策)，作为基本内容。"统一三原则"则主张，1，南北缔结互不侵犯条约；2，重开南北对话；3，举行按人口比率的普选。由此可见，前者表明的是，实现后者第2项为止的一个过程即"机能统一"过程。

至于全斗焕，正如前面所谈的，他曾提了"暂定协定"，而可以看做它的具体内容的"二十条示范工作"(1982年由当时的统一院长官孙在植所公布)，则不过是旨在实现"机能统一"的南北交流案而已。

显而易见，上述各项方案都是力图使统一不得进展到政治统一，而把分裂固定下来。卢政权的"统一政策"也是照搬他的上届政权的。

对于这一点，仅举下面两个实例就足以证实。其一，去年(1988年)发表的七·七宣言与朴正熙的"统一政策"一模一样；其二，卢政权的统一政策，"以全斗焕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作为基础，而只在展开的细节上力求柔和有所伸缩性"(《朝鲜日报》1988年6月7日)。这一姿态，在南北对话上表现得很明显。对于这一点，可举南方曾经那么悉力要求举行经济会谈为例。

经济会谈，自1984年11月至1985年11月的期间，经五次举行。

在会谈中，北方建议组成旨在共同开发资源、进

行工业、技术、农业、水产、运输电信、金融财政和商品的广泛交流的联合委员会,实现北南之间的广泛而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以期共同发展经济。然而,南方则象是同外国做某种交流那样,主张只进行物资交易(贸易)和人员的交流,而且还要按阶段逐一解决。这当然不是想要消除南北之间的不信任和误解,进而建立具体的合作关系来实现统一的态度,相反,是要拿有限的南北交流来代替统一问题的做法。

2月11日内阁会议通过的《关于南北交流的特别法案》,也是同样的东西。这个法案,对没有取得南朝鲜"国籍"的海外公民访问南朝鲜和进行经济交流及南北之间的物资与人员交流等做了规定,而其条款内容则与控制同外国进行的交流无异。

仅举经济交流为例,他们碍于体面,口头上说,把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看成民族内部的物资转移另行处理,但实际上却要照搬外汇管理法、外资进口法等有关对外贸易的各种法规来对付。他们并没有想把经济交流导向统一的中间阶段,而恰恰相反,要利用它来制造"改善了的分裂"。

从去年(1988年)8月19日起举行的旨在筹备北南国会联席会议的双方接触取得了何种结果呢?这次会谈的用意,本来在于北南共同举办第24届奥运会,为国家的统一开辟良好的前景,同时防止单独举办奥运会。因此,北方提出了一系列紧要的议题,如:共同

举办奥运会问题、发表北南互不侵犯宣言，以消除南北之间的不信任和误解的问题和包括南方提出的问题在内的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保障和平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统一打开良好的局面。但是，南朝鲜当局却不然，他们不但阴谋把议题限于北方参加奥运会问题，而且竟提出分裂主义的主张，说："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南北体育队应并排各自列队，以奥运会旗为前导，各自打着自己的国旗行进入场。"

至于对发表互不侵犯宣言问题，他们建议说，要各自向双方政府提出"劝告"。国会本是立法机关，居行政机关之上，同时负有从"政治上"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义务。因此，国会的联席会议，应自始至终讨论政治问题。

但是，南方当局竟主张，发表互不侵犯宣言的权限属于政府，并力图把议题限于人道的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为了进行"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这种接触都给予破坏了。

"七·七宣言"、"体制联合"

就是卢政权所提倡的"关于南北关系的特别宣言"也没有超出这一"统一论"的旧框框。对于这一点，只介绍下列几点，就足以证明，而并不需要对其内容作

具体分析。

“七·七宣言中的第四、五、六项的内容本质上是，与1973年朴正熙发表的六·二三宣言内容相同；第一、三项，则与1982年统一院长官孙在植发表的“二十条示范工作”的第七、十四项相吻合的，因此说，七·七宣言根本没有新的东西，而是把朴正熙、李厚洛、孙在植等人说的话凑合起来，由卢总统重说一番罢了。”（平民党议员李赞九）

对于这一点，“总统”本人的言论也作了证明。卢泰愚在发表宣言前夕即6月底会见外国记者时说，今后的南北关系，将以全斗焕所说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 里所提到的“关于南北基本关系的暂定协定”为基础。还有，“国务总理”在发表宣言的前两天，在国会上说：“政府将把从前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做为基本政策”。

这么说来，就可以明白这里没有一点新的东西。然而，南朝鲜当局却自卖自夸，大加赞赏说，这是“认识和表现上的大转变”，是“划时代的统一方案”等。

但是，人们应该知道，对于南朝鲜当局所持的这种姿态，有人批评道：“他们把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发表的声明、建议、主张、发言等汇总起来，把它说成是象样的统一政策，但从真正的意义来看，决不可能把它看做是统一政策。”（《东亚日报》1988年7月1日）

这是曾任统一院长官的董勋所说的话，他是负责

过统一问题的人，他的言论，对卢政权来说确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卢泰愚的“宣言”，也是出于“阶段统一论”，这一点是人们应该注目的。他们虽在口头上说，“民族共同体”呀，什么呀的，但这个“宣言”的骨子里，还是没有摆脱“统一的阶段式方法论”，在宣扬分为非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统一这样的三个阶段的统一途径。不仅如此，这个阶段论，把焦点放在“北方的变化”上，妄图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进而“促进北方社会的开放”。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便是北方政策。

这个北方政策，本是朴正熙所首倡，在1973年的六·二三宣言提出的。然而，运用北方政策的方法，卢泰愚与朴正熙不同。朴正熙曾想把北南对话利用于北方政策，拿它把分裂固定下来，而卢泰愚则妄图首先推进北方政策造成一定的国际环境之后，再举行北南对话，进而把分裂固定下去。

卢泰愚在去年10月4日发表的国情演说中所说的一句话“若改善了同北方的关系，它将促进北方的开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卢泰愚的心腹、北方政策的实际推行人青瓦台的朴哲彦说的更为露骨，他说，北方政策的目标，在于“促进北方内部体制的变化和对外开放”。（《新东亚》1988年第九期）

他们的言论里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把南北

关系理解为“对抗”。尽管有人吹捧“宣言”说，它把今后的南北关系，转变成从“敌对”走向“信赖”、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竞争”走向“结伴”，但根据“北方政策”的目的考察它的实质，就不难看出它并没有超出朴正熙所主张的从“没有对话的对抗”转变成“有对话的对抗”的这个旧框框。

那么，南朝鲜当局为何给“统一论”和“对话论”运用机能主义和阶段论呢？一句话，因为他们把南北的统一误认为体制的合并。

因为他们想把互不相同的两个体制合并成一个体制，所以自然一方面产生“谁胜谁负”的敌对关系，另一方面，自然会产生主张“应首先着手解决双方之利害关系较少对立的非政治问题”的见解，强调有必要按阶段接近。

南朝鲜当局持有“谁胜谁负”这一对抗性见解，所以他们所宣扬的所谓旨在消除紧张局势的“固定和平”这句话里，也难免回响着力求分裂的回音。还有，对人道主义的交流和经济交流，他们也不能不首先考虑“盟国的利害关系”，想把这一交流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限制。

假定说通过基于机能主义逻辑的交流会产生当局所说的那种收敛作用，那过不多久它也必将碰到政治障碍。换句话说，绝不可能由“机能统一”、“能够实现的统一”产生飞跃，跃到“应该达到的统一”。

南朝鲜所主张的统一政策，乍看起来好象很合理而又切实可行，但是，说到头，它一碰到最重要的问题即政治和解问题，必将受挫。目前在南朝鲜，人们已摈弃即使从逻辑上加以探讨也不能不驰向固定分裂的那条路的官方“统一政策”，趋向于民众的统一议论，并将日趋高昂。尤其，这种议论已产生很大的变化，越过抽象地议论统一的阶段，描绘着南北联邦制统一国家这一具体的形象向前发展。

据说，为了对付“民众统一论”，卢政权正在计划发表新的统一政策。据人们的谈论，在这里将提出“国家联合”或“体制联合”。统一院长官李洪九也以介绍宣传的口吻，再三地暗示过这一点。

至今因为他们还没有汇总意见迟迟不敢发表这个政策，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如不摈弃上述的姿态和逻辑，就决不能提出能使民众首肯的那种政策。

首先要放弃朴政权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统一逻辑。

（《统一评论》1989年第五期）

官方统一论的轨迹

康　德　珠

（一）

“使90年代成为民族统一的年代”，这是七千万朝鲜民族的一致心愿。1992年，将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运动中成为转折点。1988年和1989年，南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运动急剧高昂，给向往统一的同胞带来了一线希望。

在南朝鲜，争取统一的运动已发展成为有各阶层民众参加的群众性运动，他们把联邦制统一当做共同的统一方案，从这个事实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运动的前途。

北朝鲜早就主张，以互相承认和尊重双方在制度上的差别为前提的联邦制统一方案；1988年，向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提出了为实现成为解决统一问题的前提条件的裁军问题，保证和平的四项原则以及包括更多方面的和平方案。这是要在1995年打开统一的大门，实现撤走驻南朝鲜美军，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方案。

但是，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仍有很大的障

碍。美国和卢泰愚政权依然一意孤行地推行“两个朝鲜”政策。卢泰愚的北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国际上孤立北方,使之接受“两个朝鲜”政策,进而向北方吹入“自由之风”,使其瓦解崩溃,以便把南方的独裁体制扩大到北方来实现“统一”。这种敌视政策,显然是妨碍统一的。

现时,世界正处在新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东欧局势的变化,给雅尔塔协定后形成的体制,也就是把世界分成特定的不同势力范围的体制带来了急剧的变化。这就要求替代瓦解了的第二次大战后的冷战体制的新的世界秩序出现。新的秩序应该是,促使帝国主义灭亡,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实现所有民族平等和解放,坚持民族的自主和尊严。

在这样的形势下,朝鲜的统一问题就成为消除冷战方面的一个紧急任务。事实上,如果不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新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朝鲜的统一得不到实现,远东就会依然处于冷战状态,而且冷战状态有可能再次扩大到世界范围。

欧洲形势在变化,但是,远东仍在扩充军备。在远东,要求建立地区性合作体系的呼声很强烈,然而,如果不解决朝鲜问题,那只能是画饼充饥。

这就是迫切要求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理由所在。

这个迫切要求正是落在朝鲜民族身上的首要任务,这是毋庸赘言的。即使世界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统

一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相反，朝鲜民族负有实现国家的自主统一，以此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的历史任务。

今天，世界秩序有了变化，特别是，朝鲜的统一问题也面临着新的年代，在这里有必要对一向妨碍统一，而且往后也将成为妨碍物的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方案作一番总结。正确地认识统一的妨碍物，这是为解决问题所必须完成的课题，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对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政策的施展过程作总的研讨。

国土分割和"北进统一"论

1945年，苏美两国分别进驻朝鲜北部和南部，这就是朝鲜国土被分割为两部分的开端。但是，直到1948年建立南朝鲜单独政府之前，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南北之间，人或书信来往多少还是能通行的。

由于建立南朝鲜单独政府，分裂状态也就定下来，此后，李承晚政权的"北进统一政策"和由此而来的南朝鲜当局对要求统一的势力的镇压，就把这种状态固定下来了。

以38度线为界，苏美两军分别进驻朝鲜北部和南部，原是为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的过渡性措施，但是，由于美国要把他们的战后战略付诸实现，它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在远东的冷战的象征，结

果38度线变成了“国境”线。

在这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美军政当局。同时，应该说，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是通过李承晚及其一派的反民族的政策得到贯彻的。

李承晚及其一派（韩民党）执拗地开展反托管运动和单独选举、单独政府运动，美国则以此为借口破坏了旨在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的苏美联合委员会。

反托管运动和单独选举、单独政府运动帮助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基于波茨坦会谈的国际协约，预定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独立的苏、美、英三外长会议（莫斯科）决定。这样，美国便破坏了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在南朝鲜建立了单独政府，使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

这样建立起来的南朝鲜政府当然是极其反共的，因为它是冷战的产物。它的反共性质集中地表现在对统一问题的态度上。

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在宣布南朝鲜单独政府成立的演说中，第一次正式表明了南朝鲜政府对统一问题的立场。他在演说中指出：“1，韩国政府是根据宪法规定建立起来的具有对整个朝鲜半岛的主权的唯一的合法政府；2，在北方实行选举，以补充国会的100个空缺的席位；3，韩国有权以武力收复对北方的主权。”（《统一白皮书》立法参考资料146期）

1967年《国会报》登载的文章《我国统一政策轨迹》，

对李承晚政权的统一政策，作了扼要的叙述：

“在联合国监督下，只在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北进统一；原则上只在北朝鲜举行选举，也可以举行全国普选，但要以南朝鲜宪法为基础，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南北人口比例自由选举；必须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北朝鲜全境，全部共产军撤走后举行选举；以南朝鲜主权扩充为国政的第三届国会的统一案；1959年，自由党提出的北进统一同联合国军一同北进，美国协助下北进；单独北进）；在南朝鲜宪法秩序下的南北统一。”（《国会报》1967月6月25日）

李承晚政权的统一政策，扼要地说，就是联合国监督下的南北（或只在北方）选举案和诉诸于武力的“北进统一”案。不管怎么说，都是表明，南方要吸收北方来进行统辖。在联合国监督下的普选（或北方单独选举）多半是为对外宣传的口号，而基本是“北进统一案”。

1947年1月，李承晚政权把“北进统一”宣布为国政，而在实际上，以“北进统一”为口号，发动了朝鲜战争。

1950年7月19日，李承晚在战争开始后，第一次向杜鲁门表明南朝鲜的正式立场说：“联合国军的作战目标不应该是恢复战前状况，应该是完成北进统一。”美国在当年8月17日则宣布由南朝鲜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才是联合国军的目标。（驻联合国美国大使奥斯汀）

李承晚政权在朝鲜停战后，仍然主张用武力实

现"北进统一"。根据停战协定进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外务部长官卞荣泰在14项提案中提出，在联合国监督下，按人口比例举行普选，联合国军方面也提出"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结果他们单方面地破坏了会谈。

日内瓦会议后，李承晚政权又"作为统一方案提出单独北进统一论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北朝鲜单独普选论"（外务部外交研究院发行《统一问题研究》第1卷），可见他们从未抛弃"北进统一论"。

1954年7月，李承晚在美国国会上演说时说："要在苏联的核攻击力量得到强化之前，发动旨在破坏其中心部的预备战争"，这决不是出于偶然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土重新卷入战火之中。战争期间，用强权建立的独裁体制的加强，引起了统治阶层内部对他的反感，出现了勾心斗角的现象。因为失去了大众的信赖，如果发动战争，只能招致政权的崩溃。

于是，1954年11月11日，第三次国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北朝鲜地区全部撤消共产军后，举行选举，从而扩充南朝鲜主权，这就是国政。"1959年，李承晚的自由党又提出，要用武力实现北进统一，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为了从政治危机中制止内部的混乱局面，转移民众的耳目而搞的把戏。

为反对1960年3月的舞弊选举，马山发起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此为开端的四·一九人民起义终于打倒了

李承晚政权。这等于宣告：武力“北进统一”政策的总破产，同时，那是战后形成的第一次高涨的民众统一运动。

李承晚政权崩溃后，继许政过渡政府出现的张勉政权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改正北进统一之类的冒险的乱来的口号，实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南北自由选举的统治政策。”（外交施政方针第七条1960年8月24日）

这样，李承晚的“北进统一”即完全破产，“在联合国监督下的普选”又提为正式的统一方案。它的目的，是要借联合国之名来抑制民众高昂的向往统一的志向。

这里所说的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普选建立的“统一国家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金学俊《南北韩统一议论阐述》）

由此可见，“张勉政府照搬李承晚政府的统一路线，连一步也没有前进。”（同上书）这样的指摘是完全正确的。

进入1961年，民众的统一运动急剧扩大。当年1月9日，“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为宗旨的祖国统一民族战线宣布成立，同月25日，成立了有35个政党、社会团体参加的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民众强烈要求，通过自主统一协商来实现统一。

1月5日《韩国日报》社论指出，民众对统一的愿望“达到了再也无法抑制的阶段”，在1月15日社论中又写

道："张勉政权对统一的态度只能说是向李承晚时代开倒车"。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在纪念四·一九起义一周年宣言中，表明了有关统一问题的决心，汉城大学民族统一学生联盟的学生们在5月4日，以代议员会议的名义通过了召开北南学生会谈的决议。然后，展开了争取在5月20日召开北南学生会谈的运动。张勉政权的统一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

胜共统一论的复活

李承晚政权的"北进统一"也罢，张勉政权的"联合国监督下的普选"也罢，都是企图把北方吸收到南方的体制中来的，在这一点上同样的是胜共统一论。

四·一九起义意味着这套胜共统一论的破产，然而，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又使胜共统一论复活起来了。朴正熙军事独裁集团建立了以反共法为基点的镇压法体制，一概禁止议论统一问题，扼杀了争取统一运动。

朴正熙在他的自传《我们民族的前进道路》中做了如下的断言：同北方的"共产党（北方的共产主义者）进行协商就是败北的起端"。他还说，除了胜共统一，别的都是荒诞的空话，"统一问题再紧迫，也不能改变其方法"（1964年11月3日）。他表明，要沿袭从李承晚时

期实行的政策的立场。他说，“为了统一国土，要培养能够同共产主义较量的实力”，并提出了“实力培养论”。这就是“先建设，后统一”论的理论根据。

但是，朴正熙并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统一方案或政策。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与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有关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朴正熙政权不得不对此采取相应的政策，提出统一方案。

实际上，制造分裂的一方即联合国在其组成上有了很大变化。从1966年开始，有关取消“联合国朝鲜统一委员会”的问题和撤走联合国军的问题提到联大议程上来，并对此进行了表决。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鉴于这种情况，朴正熙军事政权对统一问题表示了新的意图。他们于1966年10月提出《统一白皮书》，12月，举行了有关统一问题的国会听证会，1966年，成立了国土统一院。

这个《统一白皮书》，可以说是，“议会政治历史上，国会第一次表示要正式讨论统一问题的意图”（《安保统一问题基本资料》东亚日报社发行）。这暴露了除了李承晚政权主张极端的北进统一论，历届政权都非常消极地对待统一问题的反民族的态度，说明了朴正熙政权在统一问题上的危机。

《统一白皮书》对朴政权的统一政策，指出了如下几点：①在联合国监督下，按人口比例举行南北普选

的方案没有改变；②所谓外国军队撤走后，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和平统一，通过南北协商及文化交流实现统一，这不过是北朝鲜的伪装策略；③要促进现代化，使国内体制完善，积蓄能够战胜北方的力量；④国际形势不发生大转变，就不会有可以扭转局面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如果说，朴正熙政权和历届政权有所不同，那就是他提出了“实力培养论”，把分裂认定为既成事实，并企图使它长期化。朴正熙在1965年1月所做的新年致词中指出“为了统一，要促进现代化，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他在签定韩日条约的那年6月，同记者见面时说，“南北统一问题，要等到70年代后半期再讨论。”“先建设，后统一”，从他这一口号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持有认为统一是与民族的存亡有关的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观点。

分裂长期化——“两个朝鲜政策”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朝鲜半岛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剧变。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苏美开始缓和紧张局势；由于尼克松主义，朝鲜半岛问题趋于“朝鲜化”等等，这些变化引起了对注重反共的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的敌对态度的非难，使向往实现统一的社会舆论急剧扩大。

举例来说，国土统一院从1969年9月到12月期间，

进行舆论调查，调查对象中的90.6%回答说:“必须实现统一”，其中的80%要求早日实现统一。这种形势迫使朴政权抛弃了一直在坚持的“胜共统一”论。

1970年，朴正熙在八·一五纪念仪式上，对北方提出“善意的竞争”，这暗示着对北方政权的默认，并转入南北“和平共处”政策。这是因为朴政权意识到了对统一的社会舆论在不断扩大。

这种变化也正反映了美国对南朝鲜政策的变化。前美国防部副部长助理阿卜勒母魏茨受国防部委托，在1971～1972年间写的论文中，提到了这类政策改变的主要内容。

他指出:“需要的是南朝鲜的‘对北方政策’，即:承认北朝鲜的现状，为使北朝鲜参加任何种类的一切问题的讨论做准备。这从本质上来说，给南朝鲜坚持了18年的立场带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把北朝鲜屡次提出的提案的一部分接受为协商的基础。”(《朝鲜半岛雪融解冻现象和强大国》)

具体地说，南朝鲜①要响应北南协商；②协商过程，最终是要北南同时加入联合国；③提议召开“东北亚会议”(有关的六国会议)等等。重要的是，正如阿卜勒母魏茨自己所承认的，上述提案都是“承认朝鲜分裂状态”的。

由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改变，朴正熙政权响应了北朝鲜一贯主张的北南协商的倡议。从1971年9月20日

开始举行北南红十字预备会谈；1972年5月和6月，举行了北南高级会谈，7月4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南北联合声明。

就南北联合声明的政治背景来说，不管美国和朴政权的本意如何，说明他们承认了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固执地主张胜共统一、“先建设，后统一”了。

北朝鲜一向坚持南北联合声明中阐明的祖国统一三大原则，这使他们的企图无法得逞。陷于骑虎难下处境的朴正熙匪帮叫嚷，“不能寄托命运于一纸空文”后来南北会谈一旦触礁，便说，“保安危机”，“整顿体制的必要性”等等，找借口来实行“十月维新”，一概禁止谈论统一问题，把它变成了他们的独占物。

朴正熙在1972年1月与记者会见时说：“我国的统一，除非客观形势成熟，很难实现。……新罗的文武王有意于统一，而经过一百二十年才实现统一。……这事切勿操之过急。”（《朝鲜日报》1972年1月12日）并表明，军事独裁政权无意实现统一。

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发表的“关于和平统一外交特别宣言”，清楚地暴露了军事独裁政权的反统一立场。六·二三宣言的内容是①互不干涉内政；②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③对非敌对关系的共产国家实行门户开放等。当时的总理金钟泌对此宣言加以说明，“我们虽然不希望一个民族分成两个国家，但如果这是为了和平的，南朝鲜的方针是暂且承认分裂的现实。”（《读

卖新闻》1973年6月23日）这显然是公然把“两个朝鲜”当做政策的。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通过这个声明，日本政府暴露了它也是朝鲜半岛统一的障碍物。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水野清就朴正熙的“宣言”说：“老实说，那是经日本外务省说服而成的。幸而，南朝鲜当局的理解很深，所以才出现那样的声明。”（《每日新闻》1973年9月7日）可见，日本政府和“两个朝鲜”政策的关系是很深的。

六·二三宣言不过是忠实地沿袭了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变更，它就是在那以后的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政策的基础，卢泰愚的对北方政策、南北交流案的基础也不外乎是这个六·二三宣言。

这个六·二三宣言也反映了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政策的另一个变化。正如金钟泌所说的，要借维护和平之名，把分裂当做既成事实。换句话说，以前的以胜共统一论为基础的“先建设，后统一”，变为以“两个朝鲜”论为基础的“先和平，后统一”了。

六·二三宣言后发表的“统一三原则”（1974年8月15日）首先主张构筑以“和平的固定”为前提的共存体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上述的表现。1978年1月18日，朴正熙在年初会见记者时明确指出：“我们对统一问题的根本立场是，在实现统一的条件成熟以前，不相争斗，维持共存。我们对统一的方针是，先和平，后统

缔结南北互不侵犯条约(1974年1月提案),组成南北民间经济合作机构(1976年6月提案)等提案,可以说都是以"先和平,后统一"论为基础的。

但是,必须知道,这个"先和平,后统一"论是为对付北朝鲜一贯主张的要首先解决政治军事问题这一逻辑而强调的论点。另外,这个"先和平,后统一"论的论据就是所谓机能主义的联合论。

这是早从1970年夏就大加议论的问题,它的要点是:①南和北的性质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此在短时间内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②因此有必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渐进的交流,形成南北共处的关系,找出共同的利害关系;③具体说,这个过程只能是南北交流分阶段扩大的进程;④必需有南北之间稳定的和平来保障这种过程。

南朝鲜当局至今把这种机能主义的联合论当做他们的统一政策的论据。但是,进入八十年代,这种机能主义的联合论遭到民众统一论的强烈反驳。

(二)

到了八十年代,在南朝鲜,民众统一论抬了头。这可以说是对分裂以后一直顽强开展的南朝鲜民众的统

一运动的一次中途总结。

分裂后，在南朝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目的统一方案：制宪议会的少壮派15名(1949年4月，他们被借所谓国会左翼组织事件监禁)提出“南北和平统一方案七原则”；1956年11月，进步党在建党大会上发表统一方案；进步党首领曹奉岩(以容共嫌疑被处死刑)的论文《走向和平统一之路》(《中央政治》1957年10月）中的统一方案，等等。

1960年4月19日的民众起义后，社会大众党、社会党、“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等，提出了在自主和平的基础上，以民主方法实现统一的几个主要方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学生们提出南北学生会谈，而全体民众为其实现，展开斗争，可见统一运动发展已成为群众性运动。另外，还出现了奥地利式的中立统一方案。

在打倒了李承晚政权的四·一九起义后，民众运动迅速向着统一运动发展，但它由于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而遭到扼杀，由此，60年代的统一运动陷于缄默。缄默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对统一的议论在统一的主体、统一的原则等最根本的问题上，并没有得到社会上的一致意见。

在那以后，于1972年发表了具有巨大意义的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以全民族的名义确认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从此，一切有关统一

运动的提案，都以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为准绳来评价，而且统一运动都以实现这个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为宗旨。

有些人强调，七·四声明是南朝鲜独裁政权基于美国的战略，为了加强独裁而答应下来的，甚至贬低七·四声明的意义或把它完全加以否定。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对朝鲜民族拥有南北共同的统一原则的意义毫无理解的不负责任的评价。

实际上，南北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布：无论是哪种势力（包括外来势力）的统一议论，如与这项声明的原则背道而驰，对朝鲜民族来说都是敌对的，同时也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强迫另一个民族的，是对朝鲜民族自决权的侵犯。

下面谈谈，南朝鲜当局的80年代统一政策。

“统一方案”的第一次“体系化”

前面已经提到，70年代，南朝鲜政府的统一政策贯穿着机能主义的内容。这在朴正熙政权崩溃后也继承了下来。

朴正熙政权崩溃后，过渡性政权——崔圭夏政权登场，他们也曾提出“机能主义统一”。1979年12月21日，当时的统一院长官李用熙在国会上说：“在实现体制统一之前，为了试探它能否成功，要先行按机能的

统一。……计划对机能统一方案再次进行研讨，作为政策性任务继续进行研究。”(《朝鲜日报》1979年12月21日)

另外，1980年3月，在南北国会会谈第四次工作会谈时，南方代表说：“南北双方应该努力通过渐进的措施改善实现统一的条件，也就是说，致力于统一的过程。”(《东亚日报》1988年3月20日)。这样，他们公然表明“改善了的分割”才是他们的目的。

但是，到了80年代，民众统一论兴起，而南朝鲜当局再不能象以往那样抽象地谈论统一问题了。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全面危机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可以称为“新的冷战”开始的国际形势中，80年代的幕拉开了。里根政权的扩充军备路线就是当代的象征，这带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质的变化。

8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由基于有限核战争概念的战胜战略和运用同时多面报复战略组成的。再说，这种战略在亚洲的施行，包括有这样的具体内容：把日本提升为地区保安体制的基轴；把至今成为美国的“要地”的南朝鲜的作用提高到“不拒绝核战争的生死攸关的地区”；把过去经济一边倒的日韩关系扩大到军事关系；促进美、日、南朝鲜三角军事同盟化；南朝鲜的对苏前哨阵地化等。这样，朝鲜半岛成为核战场的危险空前突出地变为现实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和安全的问

题成了现实性课题，这最终是要美军从朝鲜半岛撤走，并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才可能的，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最需要的，是以分裂固定化为前提的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实现南朝鲜的政治安定。

特别是，因为全斗焕政权是靠流血的军事政变登场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政治正统性的危机，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况。于是它只好以对统一的议论来混过这危险局面，从而确保政权的正统性。

1980年10月10日，北朝鲜发表了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方案，从而提出了具体的统一国家的表象。

形势逼迫全斗焕政权提出有关统一问题的新的方案，结果，1982年1月22日发表了“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1982年1月23日《朝鲜日报》写道：

“这次提出的统一政策的意义，在于把迄今的我们关于统一的基本立场综合起来集以大成。

“这次的方案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没有脱离‘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信赖→南北交流→实现统一’，这个一贯的逐渐接近的方法。

“我们把已定的统一三原则（这里不是指七·四南北联合声明里的三大原则——援引者注）中的稳定和平（1项）和恢复信赖（2项）定在暂定协定第7项中，第3项的按人口比例的普选，则规定我们通过对宪法草案的国民投票和基于宪法的普选过程具体地加以实现。

“同时，互不侵犯协定提案和六·二三和平统一外

交政策宣言的对北方关系部分，也都包括在这次暂定协定里面。即：不可用武力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问题包含在暂定协定第2、3项里面，维持停战协定的有效期问题，收在暂定协定第4项的‘维持停战体制’之中，同时加入联合国问题，则反映在暂定协定第6项的‘尊重双方所缔结的条约和协定’里面”。

换句话说，“‘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是把70年代以后的南朝鲜当局的统一方案集以大成的”（汉城地区教会刊物编辑人联合会编《从白头山到汉拿山》第94页），“不同于维新政权（朴正熙），把统一方案加以体系化了的”。（韩同胞社会研究所民族分科编《从分裂到统一》第97页）

但是，总而言之，它的内容可以用“向往分裂”来点出它的要害。

让我们再具体地考察。

“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阐明了实现统一的步骤：①由南北代表组成“民族统一协议会议”；②在该会上制定“统一宪法”；③在南和北依据国民投票确定和公布“统一宪法”；④实行南北普选，组成统一国会和统一政府。还提议，作为在实现统一之前的实践措施，缔结7个项目的“关于南北基本关系的暂定协定”。

※暂定协定的内容如下：

1. 在建立统一的国家之前，在互惠、平等的原则上维持相互关系。

2．纠纷问题，通过互相对话、协商，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

3．互相承认各不相同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不干涉对方的内政问题。

4．维持停战体制，同时协商解除军事对峙状态的措施。

5．为了造成信赖和和合的气氛，通过交流和合作促进社会的开放。

6．尊重双方所缔结的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

7．任命政府部长级全权代表，在汉城和平壤分别开设常驻代表部。

他们还在同年2月，发表了以将上述内容付诸实现为目的的“20项示范实践事项”。

这个“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是与“1972年11月8日缔结的‘东西德意志基本条约’的复版一样的东西”（同上书第95页），分明是企图制造“两个朝鲜”的。

这一点，从把暂定协定说成是“直到实现统一为止的实践措施”（全斗焕），即中间阶段的措施这一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实际上，全斗焕的民正党强调“2 000年代统一论”（民正党《统一的主导势力——党势扩大方案》《京乡新闻》1981年9月29日），这清楚地说明，中间阶段的前提就是要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现状。

参加南北对话的南朝鲜代表之一李东馥在华盛顿

做讲演时曾露骨地说："南北统一，没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和北朝鲜接触的目的在于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状态，事先探知北朝鲜的冒险行动，而不是为解决统一问题。"（《新韩民报》1980年8月15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实例。

暂定协定第4项的协议事项是"维持停战体制，同时协商解决军事对峙状态的措施"。本来停战意味着暂时停火的战争状态，可是，却说要在维持这种状态的情况下，解除军事对峙状态，这是自相矛盾的。

解除军事对峙状态意味着把停战状态转变为巩固的和平，而这只有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的朝美双方达成协议，把停战协定变为和平协定，才能得到保障。总而言之，暂定协定第4项，就是要维持停战协定，让美军继续驻扎，长期维持军事对峙状态。由此可见，"互惠、平等"、"和平解决纠纷"等在独立国之间使用的政治用语，纯粹是为宣传而用的。

暂定协定第6项，是要把美国和南朝鲜相互防卫条约及设立美国、南朝鲜联合司令部、日本和南朝鲜条约等美国支配南朝鲜的杠杆，和使分裂固定化的国际环境，原原本本保留下来，自然毫无趋向统一的意思。

第3项和第5项，如果要成为有现实意义的提案，那么，起码"国家保安法"等敌视北方的各种法和社会制度应该改正，这一点无须多谈。

最后谈谈在"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中新提出的

设立“常驻代表部”的问题，这只能说是,制造“两个朝鲜”的准备。

《韩国日报》报道，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说，“设立联络代表部的问题是使南、北和四大有关国之间的交叉承认前进一步的措施，是美国的学者和行政部官吏们从二三年前就议论的问题。”（《韩国日报》1982年1月23日）

交叉承认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1975年9月22日在第30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它意味着，周围的有关国家把南北两方都承认为独立国。这当然是和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有关的。设置常驻代表部就是和交叉承认有关联的。

全斗焕政权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强调了南北首脑会谈的必要性，这说明，全斗焕企图成为解决统一问题的“主体”。然而，根本没有具体的对策。

由于北朝鲜的积极努力，在南方发生水灾时送去充满同胞爱的物资，后来又有过南北离散家属的相逢和艺术交流等，但是这些都没能成为实现南北交流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结果。

继承了反统一论

1987年6月，由于民众斗争高昂，独裁政权面临危机，于是通过卢泰愚的六·二九宣言依照美国的改编权力机构构思，提出了新的政策。这就是打着“实现民主化”为公约的幌子，使民族民主势力脱离民众而孤立起来，同时力图实现标榜“权力共有”的保守势力的大同团结，以树立安定的统治秩序。

卢泰愚就任总统，可以算是这一政策多少奏了效，但终于未能纠正政权的动摇状态，卢泰愚本人也得了个百分之三十总统的绰号，这个事实说明，这个政权也难免有在政治正统性方面的劣等感。

再者，“六·二九宣言”发表后，在当局的主导下进行的形式上的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措施，为充分了解其局限性的民族民众势力所利用，反而增大了为实现实际民主而施加的压力。不仅如此，从1988年初开始，民间的统一运动采取了公开的斗争形式，越发昂扬起来，使卢政权的危机更加深了。

同年4月举行的普选结果造成的“执政者少在野者多”的现象，促使卢政权开辟新的治国方式。具体地说，就是采用实现“联合保守政策”的形式，但这不过是陷于守势者的逻辑，并没能抑制旨在实现南北学生会谈的斗争和通过实现南北共同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

昂扬起来的统一运动。

※据1988年7月15日到8月2日进行的对汉城工人的意识情况调查，87%主张以“统一为国策”，80%支持南北学生会谈，73%赞成撤走核武器，83%希望南北裁军。

特别是，进入1988年后，高昂起来的民众的统一运动已不是象过去那样分散的和偶发性的。民众统一论，意味着这一运动基于对朝鲜分裂的历史和统一运动的冷静、透彻的社会科学总结和认识，有了质的发展。用一句话来说，人们重新研讨统一运动作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方面，认识到它与民主化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去开展这一运动。

这样的变化，当然地使卢政权的反共分裂保安体制连根动摇起来，因此，卢政权慌忙提出新的统一政策，以使险些发展为打倒政权运动的民众统一运动的锋芒转向别处，这种做法并不新奇。卢泰愚的七·七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1988年发表的七·七宣言声称，北朝鲜是“民族共同体”，企图给人以实现南北交流的幻想。这给人带来了这样的印象：卢政权一改迄今坚持的强硬态度，在摸索和解的途径。

《东亚日报》在文章中写道：

“这次的宣言，在国内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政府有必要将各种追求统一论调总括起来，建立政府一

级的新的追求统一论调。”(《东亚日报》1988年7月8日)卢泰愚本来就想通过“窗口一元化”政策，把民间级的追求统一议论的扩大及其付诸实现的斗争束缚于体制的，把民众运动套进体制的框框里面，所以提出这样的统一政策可以说是必然的事。因此，它给人一种即兴之作或七拼八凑的东西这样的印象，也不足为怪。实际上，卢泰愚的宣言不过是沿袭了先任者的统一政策。

平民党李赞九议员指出：

“七·七提案中的第四、五、六项的内容本质上是与1973年朴正熙发表的六·二三宣言内容相同；第一、三项则与1982年统一院长官孙在植发表的二十条示范工作中的第七、十四项相吻合的。因此说，七·七宣言根本没有新的东西，而是把朴正熙、李厚洛、孙在植等人说的话凑合起来由卢总统重说一番罢了。”(《朝鲜日报》1988年7月8日)

卢泰愚本身的言语也证实了上述的说法。他在1988年初进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促进南北基本关系暂定协定的缔结和南北部长级会议的定期化”，就统一问题，说要以全斗焕政权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为基本路线。卢泰愚在发表宣言之前，6月里在同外国记者见面时说，今后南北关系要以全斗焕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中的“关于南北基本关系的暂定协定”为基础。发表宣言的前两天，国务总理也在国会本会上说“政府将以从前的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为基本政策”。

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新的东西可谈。尽管如此，卢政权却大加渲染说，这是“认识和设想的转变”，是“划时代的统一方案”，实在令人喷饭。前统一院长官董勋曾指出：“他们把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发表的声明、建议、主张、发言等汇总起来，把它说成是象样的统一政策，但从真正的意义来看，决不可能把它看做是统一政策。”(《东亚日报》1987年7月1日)这一发言象是预示了七·七宣言的本色。

七·七宣言里，提出了“统一的阶段方法论”即：非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统一，这样的分三阶段方案，显然是沿袭了先任者的“分阶段统一论”。

还有，这个宣言对解除军事对峙状态问题只字未提，这一点被指责为致命的缺点。

国家联合和“正常的分裂”

以“窗口一元化”政策为前提的七·七宣言被民众贴上了分文不值的标签。不止这样，七·七宣言还带来了促使实现自主的南北民间交流的民众运动越发壮大的后果。

同时，南朝鲜的统一运动中产生了使“正确认识北方的运动”急剧扩大的现象。这对统一运动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应特别指出的是，直到那时，虽未能

超出愿望、理想的范围的统一问题，却给民众提出了现实性的、有可能实现的具体任务，不仅如此，认识到北朝鲜是可以和解的同族，同样是实现统一的主体，这是宝贵的成就。

换句话说，自从国土分裂后，一直成为独裁政权的大前提的反共体制开始瓦解了。

在这方面的突出的实例就是把“达到沸点的民众的统一愿望”（文益焕）付诸实践的文益焕牧师访问平壤。特别是，文牧师胸怀于4月16日举行的“有关韩半岛的和平和祖国的自主统一的国民大讨论会”提出的七项统一方案，同北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交换意见后，对于以七·四联合声明为基础的联邦制统一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对卢泰愚政权来说，是一次无可估量的冲击。

尤其是，“全大协”（全国大学生代表协议会）的林秀卿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更加深了卢政权的危机感，这是不而言喻的。卢泰愚政权照例对统一运动严加镇压。在政治上实行全面的“公安统治”，发动“国家保安法”，开始大肆攻击民族民主势力。

尽管他们对统一势力施加全面镇压，民众却把七·七宣言视为一张废纸。卢泰愚政权一面在政治上实行“公安统治”，另一方面，为了阻挠民间的自主统一运动，防止这种气势影响到中间一层的政治势力中来，

不得不把七·七宣言改为具有具体的实际措施的新的统一方案。

在8月15日，光复节纪念仪式上所做的卢泰愚的演说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他的演说，指明卢政权的“统一方案的基本要害”（《朝鲜日报》8月15日）。可是，那里只有统一原则和统一方案的轮廓。因此，必须出现以此为基础的第二个七·七宣言。“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正是这样出现的。在这里，先不提八·一五演说，而谈谈9月11日发表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

这个方案的要点有如下几条：①基于自主、和平、民主原则，经南北联合的中间阶段，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②统一国家，应该是自由、人权、幸福得到保障的民主国家；③统一国家应成为单一国家，如具有各不相同的理念和体制的两个国家共存，那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④为了促进民族社会的同质化和合并，应首先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共同体；⑤必须先建立过渡性统一体制即南北联合的阶段，以做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中间过程；⑥设南北首脑会议为南北联合的最高决策机关；双方派政府代表组织南北部长级会议；由双方的国会议员组成南北评议会。双方分别派常驻代表驻平壤与汉城；⑦为了商讨上述问题举行南北首脑会谈；⑧北朝鲜应放弃赤化统一政策，保障自由和人权（与南方同样的）。

显而易见，卢政权把七·四南北联合声明所明确规定的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撕毁了，从正面反对联邦制的统一，把统一问题改换成了一方吸收或合并另一方的问题，即完成体制联合（单一国家）的问题。对于实现这个方案的方法，他们提出进行选举，而到头来说，他们主张根据这一选举产生的政权，应该是"民主共和国"（意为北方放弃社会主义，采纳南方的体制）。

为此，他们需要的，只有"民主"这个原则，而民族大团结这一原则，则不再需要了。

至于对解决统一问题的前提即消除政治军事上的对峙状态的问题，他们连提都没提一句。勉强提的一句说，要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却对这个协定的当事人——美国，根本不涉及一字半句。对于北朝鲜至今一直主张的裁军和维持和平的建议，也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回答。

到了今天，谁若是对军事对峙状态背过脸不谈，那么，那种建议，决不能当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方案，这是最明白不过的。

还有一件事应说明白，在这方案中，把国家联合当成了走向完全统一的中间阶段。毋庸赘言，这是朴正熙提出的阶段论的仿效品。我对此只想强调一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国家联合，意味着南北双方各自做为主权国家存在，即意味两个国家并存。

据这个方案的提法,国家联合即两个国家之并存,是南北双方在中间阶段的一种存在方式,并从此经机能主义的融合过程,逐渐走向完全的统一(单一国家)。本来,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人们若先做让步承认它有可能性也罢了,但在这方案里根本没有谈到,为保障这一行程应采取的制度上的措施。虽提出“南北首脑会议”、“南北部长级会议”和“南北评议会”等,但考虑到这个国家联合只重视互不干涉内政,而且南北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体制等情况,就难免不令人怀疑,这些机构能不能做为一个协商机构起应有的作用。与此相反,因为南北双方各自强调自己主权的独立性,结果,加深对抗的可能性却很大。

甚至对北方说什么“该放弃赤化统一政策”、“要保障自由、人权”,这也是荒谬透顶的。严格说来,说北朝鲜曾主张过“赤化统一”,那是不符事实的。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北朝鲜从没提过那种主张。北朝鲜从来就是把统一问题与消除南朝鲜独裁体制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对待的。事情既然如此,他们却竟敢说什么“赤化统一”等等,那是为了把统一问题弄成模糊不清的东西的,也是随意所作的歪曲。至少是北朝鲜从开始主张联邦制统一以来,“赤化统一论”已经不复存在了。

很清楚,卢泰愚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论”是不能成为统一方案。目前,南朝鲜民众把北朝鲜提出的联

邦制统一方案评为最合理的统一方案，并致力于以联邦制统一为基础来制定独立的统一方案。“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不止不是旨在实现统一的，说它是要对上述的行动加以压制的东西，也不算言过其实。

说得具体些，也可以说是为对付北朝鲜提出的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而抛出的。

老实说，他们的方案里没有实现统一的意愿，而它的实质只有要同北方对抗的姿态。

如上所述，从朴正熙政权直至今日的南朝鲜当局所拿出的统一方案，始终贯穿着要把分裂状态合法化(所谓的从非正常的分裂状态转向正常的分裂状态)的目的。而且为了把它加以合法化，他们拿出了阶段论、机能主义的融合论、收敛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可是，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凑合成的统一方案，不管它如何装潢门面，到头只能成为分裂方案。

南朝鲜当前的焦点

1　文益焕牧师访问北朝鲜所引起的风波

可谓南朝鲜反体制派人物代表的文益焕（全民联常任顾问）牧师的访问北朝鲜，轰动了国内外社会。

文牧师于1989年3月25日突然访问北朝鲜，拜见金日成主席，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士和基督教人士会谈，就积极推进统一问题达成协议。

对此，南朝鲜当局则借口他事先没有同当局协商，企图动用“国家保安法”加以镇压。

但是目前南朝鲜的现实情况如何呢？南朝鲜社会的各阶层人士都说，“国家保安法”本身就是与南北关系的现况不符的镇压法，并异口同声地要求即刻废除该法；另一方面，在南北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卢政权本身也干下了超出法规的各种行动，自行否定了该法之存在。

该法规定，北朝鲜为反国家团体统治的地区，谁若访问该地应处极刑。但是，对今年1月南朝鲜财阀现代财团会长郑周永访问北朝鲜一事，政府说，那是事先得到允许的属于总统的“统治行为”，而这次文牧师

则与此不同，那么，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来分析，这个理说不过去，缺乏说服力。

南朝鲜当局所以不得不压制文牧师，自然有其原因：他们认为，对这种行动如不加阻止而放任不管，就无法制止在野人士、学生、宗教界、文艺界、农民等民间的广泛的南北自由交流。就其结果来说，文牧师的访问北朝鲜，总算打破“由政府独霸的对话窗口一元化”这一最大的壁障，给民间的统一对话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南朝鲜的在野团体、学生和宗教界发表声明，支持文益焕牧师访问北朝鲜，对卢政权对他的镇压行为表示反对。

在野的联合机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联合”（简称全民联）于1989年3月27日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的访问北朝鲜，成了“进一步发展民族的、民众的统一运动的契机”。对政府所持的镇压姿态谴责说，政府“再不该背向民众的统一热情，应停止镇压统一运动”。同一天，这个团体决定祖国统一运动为上半期斗争的新的中心任务，从正面与政府的镇压姿态对峙。

同一天，“进步政治联合”也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期望“文牧师对北朝鲜的访问将成为一个契机，集结全民族的统一意志，促进民族统一”，并对他的访问北朝鲜表示欢迎。声明接着强调说，“应该把文牧师的访北看成他以坚决的行动告诉人们实现统一的主体正是国民自己这一真理的事件。”

学生组织“全国大学生代表协议会”(简称全大协)发表声明指出,这次访问北朝鲜“是给(政府)妄图独霸统一议论的企图打进楔子的壮举”,并主张,“借此机会,(政府)应立刻停止至今对全民联提倡的关于举行泛民族大会和全大协要求参加平壤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等问题所采取的反民族的丑恶行为。”

还有,最近组建的韩国基督教社会联合也发表声明,“妄图以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国民要求统一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时代错误的‘国家保安法’为依据,肆意进行拘捕和搜查,是极不正当的”,并主张应立即废除“国家保安法”。

卢政权借文牧师访问北朝鲜的机会,给自主、民主、统一势力标上“容共、左倾”的标签,正在大肆加以镇压,但这只能自行暴露自己的反对统一追求分裂的姿态。

2　对抗意图愈益加深的南朝鲜政治局势

本来卢泰愚掌权后曾允诺过一段时间做一次评价,人们对此确信无疑,而到最近卢泰愚却发表特别谈话,声称这个评价要延期举行,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风波。在野人士和学生等对这个声明毫不理会,接连表明态度说,他们要继续坚持要求卢泰愚下台的运动,与

政府和执政党对抗的态势一直在加强。

“全民联”、“全大协”等十个在野及学生团体参加的“促使卢泰愚下台的共同斗争本部”于1989年3月20日发表声明申明,尽管卢泰愚发表了特别谈话,在野势力和学生还将联合力量继续开展要求卢泰愚下台的运动。这个团体在声明里说,卢泰愚发表这类特别谈话是他们早已料到的,并不感到意外,这是卢某欺骗和愚弄国民的勾当,并且要求不想清算第五共和国和查究光州惨案真相的现政权,自行下台。

众所周知,在野势力和学生于3月14日组建了“促使卢泰愚政权下台的共同斗争本部”,而常设共同本部的组建是和目前学生要参加“全民联”的问题有关系的引人注目的事。

这个共同斗争本部提出了如下几条要求卢泰愚下台的理由:①他是“一二·一二肃军”与光州惨案和第五共和国所犯舞弊案的共犯;②靠舞弊选举掌权;③对民众的生存权施加暴力镇压;④奉行欺骗国民的北方政策,等等。

这个团体,计划今后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特别是要将在各地区进行的工人的春季斗争和以郡为单位举行的农民集会与要求卢泰愚下台的斗争连系起来。

3月19日,这个团体在汉城汉阳大学首次举行了要求卢泰愚下台的群众集会,参加集会的达5000人之多,其中有不少目前正在展开劳资斗争的工会成员前来参

加，“这就明显地表明，工人运动与反政府运动正在结合起来”（《日本经济新闻》3月20日）。1989年2月13日，靠近“全民联”的15000名农民在汉城举行了示威游行，提出了政治口号，估计这种行动今后将与日俱增。

到了1989年，学生们把以争取学园民主化为主的学生运动推向大众化，宣布将进行反对卢政权的斗争，并采取方针把运动从校内转向了校外。他们的这种动向，的确令人注目。

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汉城地区总学生会所属三十八所大学的学生会于3月15日，同时各自举行了要求卢泰愚下台的总动员大会，即使在卢泰愚发表特别谈话后，他们也仍然在贯彻这一方针。

在1989年的校内运动中，值得注目的是参加运动的新入学的学生较多，可见他们在高等学校时期就进行了意识化，当局对此表示忧虑。学生们在校外，不但独立地进行斗争，还同工人加强联系，给正在展开斗争的汉城地铁工会和地区工会派去了“特别活动队”。

另外，在工运方面，汉城地铁工会斗争和现代重工业的劳资纠纷已相当尖锐，预计在1990年上半期组建的民主工会的联合组织——“全工协”（目前要求参加的工会会员已达26万人）的活动等与学生的动向有连系。

对此，南朝鲜当局硬说那是策划颠覆自由民主体制的活动，采取了施加暴力镇压的姿态。尤其卢泰愚

于22日即刚发表特别谈话之后，在青瓦台召开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内务部长官、法务部长官和治安本部长等人参加的“公安关系部长会议”，随后不仅对学生和在野团体，甚至对工人、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进行的斗争也施加镇压。他还允许数达11000名的第一线警察携带枪支，允许全国的3300个派出所常备M16自动步枪等，完全揭去了所谓民主化的面纱，从而引起了内外的非难。

卢政权所持的加剧镇压的姿态，必将更加激发自主、民主、统一势力的反抗。

3 劳资纠纷日益加剧

在南朝鲜，工人们正在积极准备组建民主工会参加的全国性组织——“全国工会协议会”(简称全工协)，同时劳资纠纷在日益加剧。

汉城地铁公司工会会员4000人于1989年3月16日举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协议事项、辞退御用社长、释放前工会委员长、停止镇压工人运动等。那一天，他们的示威游行队伍，被当局打散后，就走进平民党和民主党的办公楼，声言“要举行静坐斗争，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实现”。在这之前，他们于1989年3月6日曾开展过“免费乘车”斗争。

汉城地铁公司工会所以奋起开展抗议斗争，是因为资方没有履行1988年10月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应从1989年1月起实行的各项条款。这个协议，主要反映了工人们对生存权的要求，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变基本工资为义务工资等。但是，资方不但不执行协议事项，而且宣布说“暂时保留履行”，片面地撕毁了协议。加上卢泰愚持强硬态度，说要“硬法对付”工人运动，因此激起了工人们的更大的反抗。

汉城地铁公司工人的斗争在日趋扩大，尤其工人、学生、在野团体等许多民主团体举行了反对暴力镇压工会动员大会等活动，或共同展开斗争，对他们表示支持。由于汉城地铁公司工会在“汉城工联”占主导地位，而这“汉城工联”又在建立“全工协”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他们的今后活动引人关注。

另外，现代重工业的工人于1989年3月21日，迎接开始罢工一百天，在庆尚南道蔚山市同工人家属、学生和在野团体共同举行反对以权力干与工运的动员大会，谴责了当局镇压工人运动。在那一天的集会上，工人们发表公开信，谴责妄图用警察镇压现代重工业工人罢工的当局的暴行，并警告说，这种做法必将进一步加剧劳资纠纷。

由于从去年6月起劳资双方的协商流产，以及资方对现代财团系统的工人施加的集团恐怖事件大白于世，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工运的镇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

生和在野团体出来支持工人的斗争，于是，这种斗争越发扩大，成为大规模的斗争。当局于3月30日动员9000名警察大加镇压，结果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

此外，在尖端技术部门的企业里，工人们要求改进劳动法的运动正在扩大，在美国等外来资本经营的企业里的工人斗争也越来越活跃。

1989年，劳资纠纷每天平均发生3.3起，截止同年2月18日共发生251起。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由民主工会主导的建立“全工协”的活动也越发积极起来。

一直参加属于政府御用工会团体的“韩国劳总”(劳总)的京畿道城南地区协议会的67个企业的工会，正式宣布脱离“韩国劳总”，与“全工协”合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韩国劳总所辖的城南地区工会和全工协推进地域工会，即“城南工会协议会”所属的30个工会，3月15日举行有5500会员参加的“改订恶劣的劳动法、工资斗争工人总动员大会”，决定今后把各工会合而为一，建立“城南地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这种集体地脱离“韩国劳总”，与“全工协”合并的事例是前所未闻的，因此使当局大为震惊。

据估计，目前参加“全工协”的有：汉城、釜山、马山、全州等11个地区工会协议会和医院、外资企业、技术、建设等8种行业工会协议会等，约770个工会，会

员约达26万人。建立"全工协"的活动日益高涨，估计今后"通过春季斗争和建立全工协，以及前来参加的工会之剧增，全工协将保有应有的组织力量。"目前，南朝鲜的工人运动越发高涨。

4 《1987至1988年的韩国人权报告书》

最近，"大韩律师协会"出版的《1987至1988年韩国人权报告书》，分析了近两年南朝鲜的人权情况。该报告书指出，"由于极右势力受权力保护，恐怖活动接连不断"，并列举了极右分子的恐怖活动、军队和警察、监狱里的暴力行为、可疑的横死等几个代表性事例。该报告书还谈到，在同一时期，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等国民的生存权和各种与人权有关的事项毫无改善，对要求克服分裂体制，向往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镇压依然如故。

该报告书接着写道，清州市产业宣教会郑震东牧师的遇刺、军情报司令部成员暗杀《中央经济新闻》吴弘根部长、对于"我们庭园"施加的袭击和暴行、弄毁延世大学李汉烈烈士的遗像、放火烧毁预定举行谴责暗杀朴昌信神甫的群众集会场所——全州圣堂等事件，并非是互无关系的偶发事件，而恰恰是相互有一定联系的极右分子的恐怖行为。该报告书说，敢于干下这种

恐怖活动的集团，都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都带有亲政府倾向，敌视北方，不关心南方实现民主化和自主化，受外部的财政支援和在肇事现场受权力的保护等。

就右翼分子的恐怖活动与日俱增一事，该报告书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由极右暴力集团替代权力机关，干了过去由当局直接干的每每引起国民抵抗的野蛮暴力行动，不但能更露骨地施加暴力，还能显示当局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使极右势力作为物理支配手段发挥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蓄意煽动理念争论，在民主势力内部制造纠葛。鉴于这种情况，估计今后极右分子的恐怖活动将持续一个时期。

该报告书接着谈到军队和警察内部的人权问题，说，1980年以后在军队内自杀2 254人、被杀290人，死亡者共有2 670人，其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25倍，情况甚为严重。该报告书还说，在南朝鲜，死亡原因不明的可疑的横死和下落不明的事件接连发生，可见在南朝鲜人权问题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善，并列举了如下事例。

据报告书说，汉城大学经营学科学生金永健在学时入伍。1987年2月在金永健上等兵所属的议政府“印第安园”兵营发现了他吊死的尸体。美第八军方面验尸后发表说，是自杀。但金永健上等兵的家属和查明死因

真相委员会却提出：死者从想去医院走出家门，到发现尸体为止的这段时间里的活动无法查明；他平时对保安部施加的拷问有过意见；死者上吊的双层床只有1.2米高，而且死者的腿是下跪的姿势；没有发现他有自杀的动机，也没有留下遗书等几个问题，对保安队表示怀疑。据说，还有34名死亡者尚未查明死因。

其次，该报告书指出，监狱内的人权问题，也着实是个大问题。该报告书说，在监狱里的蹂躏人权的情况，已通过法务部发表的1987年度资料大白于世，当时在牢里死亡的囚徒有22人，自1988年1月至8月有13人死亡，他们的死因主要是心脏麻痹、呼吸障碍、窒息、脑溢血等，而且大多数是二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根据这些情况来推测，就难免不使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因受拷问而致死。

该报告书还指出，这些蹂躏人权的情况所以没有消失，是“因为人权问题终究是各社会势力角逐的产物，因而若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就无法改善人权情况。”

（《统一评论》1989年第五期）

拆除分裂的壁障

文 益 焕

何谓统一运动

分裂的四十五年，对我们朝鲜民族来说，是一个耻辱。统一运动，就是要洗刷这一耻辱。

我是认为分裂的四十五年是民族耻辱的人，让这分裂状态超过五十年，那更是忍无可忍的耻辱。我已是年过七旬的老者，曾同年轻人议论过统一。我亲眼目睹年轻人们呼喊要解决民族问题焚身跳楼的情形；我站在全身受烧伤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年轻人面前听到他呼吁人们替他“一定实现统一”的呼声，我痛切地感到内疚，为自己虚度了七十年岁月感到羞愧。

我身为老一辈人，站在毫不犹豫地献出对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的年轻人面前，感到实在羞愧难当。

我渐渐认识到，洗刷这种耻辱，正是与我个人的良心有关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主观上的想法。

居住在世界各国的侨胞，听到和看到我国分裂成南北相互攻击的消息感到的耻辱，那是客观的。

不仅是侨胞，我们国内的人民也有同样的感受，由

于我们分裂成两个，外国该多么瞧不起我们。曾经指控苏联给北方提供武器并怂恿北方南侵的人，如今却想跟苏联建交进行经济交流；同时也想和参加六·二五战争的敌国——中国进行交流，而偏偏对北方的同胞加以敌视。苏联和中国对此该多么鄙视和讥笑我们！他们会嘲笑我们，专事同室操戈，而想和他们进行交流。日本和美国也会有同样看法的。

这个历时45年的耻辱，不但是良心上感到的，也是在国际社会上感受的耻辱，这种耻辱竟持续了45年，这太长了。让分裂状态越过50年，对我来说实在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洗刷这个耻辱，就是开展统一运动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统一运动是要消除民族的痛苦和悲剧。

目前，在我们同胞之中，有数达1 000万的离散家属。据说，六·二五战争时期有300万人丧命。除此而外，不知有多少人牺牲，济州岛的四·三事件、四·一九釜山马山事件、光州惨案等所有这一切悲剧，都是民族分裂所招致的。除了这些事件，由于民族分裂，被诬为“赤色分子”在法庭受审，判死刑和坐牢的人又有多少呀！

民族统一运动正是要消除这种悲剧。

第三，统一运动是要解放民众。

工人和农民在4 000万人口中占四分之三，他们的生活如何呢？为了养活我们，他们在拼命干活，而得

到的却是年年有增无已的高筑的债台，有的人年过40还未能娶亲。担心农村荒废，咬牙忍苦，守在农村的农民，我们更应该体谅他们的苦衷。背井离乡，即使到城镇，也找不到职业，只能卖零工或摆小摊的小市民，也不计其数。

民众是民族的实际组成部分，然而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过这种生活呢!

仅据1987年的统计,就至少拨出了100亿美元充当国防费。这项国防费不是为防备外敌入侵，而是为了同本应组成民族共同体和睦相处的同族相互敌视，枪对枪地对抗所耗费的。

正因为这样，一般民众无法摆脱贫穷。因此，统一问题，可以说就是解放民众的问题。

总之，工潮和农民运动,可以说并不只限于工人、农民争取生存权，而是与统一问题相关联的问题。

第四，统一运动是要克服“黑白(分裂)逻辑”和道德败坏。

在这45年当中，分裂的逻辑即黑白逻辑一直在支配我们的思考和生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至今，我们一直持有公式化的看法，认为北方的村庄不可能有好的东西，相反，南方的村庄不可能有坏的东西。因此，若有人说，北方也有好东西，那他就会被诬为赞扬北方、同情北方者，当成犯下利敌罪行的人；若有人批判南方的缺陷要求改正，那他就会被诬为左倾容

共者，当做犯下利敌罪行者去受审。应该砸碎这个黑白逻辑的框框。正是这个黑白逻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把我们民族驱向不信任、对抗和冲突的深渊。因此，张俊河曾说过，分裂等于民族的毁灭。

第五，统一运动将对世界历史给予一定影响。

应该认识到，当今天正在开始建立新的亚洲秩序的重要时期，由于朝鲜分裂成了两个，令其不能起到应起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作用。

第六，统一运动，就是使我们民族发展的运动。

统一，并不只是单纯地从白头山至汉拿山把我们即我们民族统一成一个整体的问题，而是使我们民族大大发展的问题。

分裂，把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弄成小的了。这就意味着不仅我们的国土变小，连我们的思考范围也变小了。

因而，统一运动，正是使我们民族大大发展的事业。这就是我想要说的统一运动。

访问北朝鲜的目的

第一，就南北问题而言，迄今南方的民主势力一直为拆除分裂的壁障，倾注着努力。我想不应只在口

头上说，南方是，北方也是我们的祖国，而要亲自踏一踏北方土地，以便确认那里也是我们的祖国，这种想法促使我用实际行动来开出一条先例。这也就是拆除壁障的。

第二，金日成主席和北方的其他领导干部对统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至今得以到手的资料很少，只能靠间接的传闻来了解，所以我这次很想亲自和他们见面，开诚布公地进行商讨，并探知他们的真心实意。同时，我以为北方也和我们一样，可能是靠间接的传闻了解南方的民主化和对统一问题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去北方，把南方的局势即统一运动的进展情况直接告诉他们，起到连结南北的桥梁作用。

第三，我本人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想以一个普通人仿效政治家，通过政治会谈解决问题，打开一个突破口，为对话准备良好的契机。

我发表“四·二联合声明”后，有人说我赞同北方，我认为赞同北方并不算错。

假如丈夫说，要在园子里种玉米，妻子说该种土豆，这样的时候，总要有一方随和另一方，才能保持家庭的和睦。种了土豆，能说坏了事吗？一方主张说举行三方会谈，另一方主张该举行双边会谈。难道不就是因为各持己见，互不让步，才使分裂状态持续了45年吗？

事实上，我去北方的那段时间，为了北方主张的

政治军事会谈，我曾建议北方接受南方所主张的所有会谈和交流。对于联邦制方式也可以这么说，北方所主张的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那种联邦制，实际上是把南方主张的体制联合方案考虑在内的。这是北方对这一问题作了让步。对这种事实加以歪曲是不应该的。

我们理应首先纠正认为联邦制和民主主义两者互不相容的那种思考方式。所谓联邦制，它相当于民主主义的最基本的制度即地方自治，所以联邦制与民主主义决不是相对立的。

一般认为，北方于1980年10月改变以往所持的立场，提出了联邦制统一方案，但据我所知，北方从1960年以后一直在主张联邦制方案，而南方则一直在主张"交叉承认"和"同时加入联合国"。站在北方的立场来看，南方的主张，终究还是策划德国式分裂的。

我站在北方的立场分析，如果南方执意一定要制造两个国家，那么，就不如用联邦制方法使其固定下来为好。

反 美 意 识

就我的反美意识而言，有人说我赞同北方的主张，认为南朝鲜附属于美国，但人们也该想到，我个人的判断和北方的判断不期而合这样的现象也不是不可能

有的。这终究不是我单纯地赞同谁，而是我靠独立自主的判断得来的结论。

毋须因北方吃米饭，我们就一定要吃面包。

为建设民众成为一个整体的、民众当家作主的那种民主社会和成为一个不被外来势力奴役和支配的那种民族而努力，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北方吃米饭，南方就禁止吃米饭，那是毫无道理的。那自然是出于北方多用“同志”这个词，在南方就禁止使用这个字眼的那种愚蠢的思考方式。

我们生活在外来势力相当大的压力之下。最近的经济压力、不管我们南朝鲜农村和经济破产凋敝，无情地横加于我们头上的美国的经济压力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自主性，被人奴役的结果。

先不管北方在说什么话，我们自己应首先努力摆脱这种奴役地位，成为自主的民族。这正是现今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只要是朝鲜人都应去争取的。

老实说，南朝鲜的反美运动，不过是最近才开始的。

我1978年出狱后，《纽约时报》记者曾报道过我向他说的话：“如果你们美国不改变对韩政策，韩国必将走向反美道路”。据说，那个记者被人诘问：“南朝鲜怎么会走反美道路，你为何写出那种文章？”这事发生在1978年，但到1981年发生了火烧釜山美国文化院事件。这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放火烧文化院的，是本来极保

守的长老会神学院的学生。我根本没有预料到，在南朝鲜，反美斗争会来的这么快。那么，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何在呢？这决不是北方的煽动引起的。

在这里，我想谈几句美军问题。最近，在缓和紧张局势的趋势之下，苏联在向解除武装的方向发展。顶多不过五年，美国设在这一国度的停战线，将丧失做为对苏战略线的意义。到那个时候，美国反正将从我国撤出去的。既然美军会在五年之内撤走，那么在其撤走以前，我们应成为真正自主的民族，建立国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真心保护国民生命财产的政府。为什么竟要求要撤走的美军继续留驻，让他们来替我们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呢？这种做法出于负责国防事务的人们的根本错误的思考方式。这实在是可耻的事。这简直是对国民的亵渎，也是对60万国军的亵渎。

“国家保安法”

1976年3月1日，我被指控为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主犯，被逮捕受审。

当时的宣言内容，不外是要求在这一国度实现民主化，改正“富益富，贫益贫”的经济结构，打开统一之路。结果，被指控为违反紧急措施，被判徒刑。到1977年12月31日获释。1978年10月，又为在实施维新

宪法六周年之际发表宣言，揭露该宪法之不民主性，被指控为违反紧急措施，当局取消了让我缓期服刑的决定，我只好重新服刑。我们虽然服刑，但到头来紧急措施还是被粉碎了。

1986年，政府主张不能改动宪法，我们则主张宪法必须改，随之发生了“五·三仁川事件”。结果，我又被捕，判了徒刑，但到头来还是我们胜利了。主张护宪的政府，终于投降退让了。可是，提出正确主张的人却被送去蹲监狱，提出错误的主张最后被击败的人，却依然稳坐于权力宝座之上。但尽管如此，到头来还是我们取胜。这就是我们走过来的路程。

现在略谈“国家保安法”。“国家保安法”本是1948年自由党执政时期，为规定北方为反国家团体而制定的。在自由党执政时期，也许这是行之有理的，但到今天，情况就不同了。民正党议员曾在国会声称：“何谓统一？统一，就是把两个国家和两个体制合而为一”。可见，他没有否定卢泰愚的“七·七宣言”。换句话说，民正党没有改变把北方当做同伴者的立场。那么，在把北方当成反国家团体的时期制定的这个“国家保安法”，到了不把北方当成反国家团体的今天，为何还不废除呢？他们所以不废除此法，是因为想利用此法来做镇压国民的手段。这个反共法，分明是为镇压四·一九起义时开始高涨的统一运动而制定的，所以只要不废除此法，我们就决不能相信现政府所说的统一。应

该立即废除此法!

结　束　语

我是天生的乐天派。我对一切事，从来抱乐观态度，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可是，这次回汉城的那一天，心里却难免感到有些绝望。从客观上来看，我这次的确获得了我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巨大成果，所以他们若逮捕我，一切成果将变成泡影，统一事业至少要退后20～30年。我想到这些，心里不禁感到极大的绝望。

至于蹲监狱，我心里虽然已有准备，但还有另一心愿——愿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然而，政府却不然，扬言要逮捕我。蹲监狱，我已习惯，并不感到痛苦，但一想到民族的将来，心里就不情愿了。

可是，我从没有悲观。因为我相信，北方和南方的对统一的热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我就是在被拘禁的现在，还是想和政府进行对话。直到现在，我是一直跟政府进行对话的。在1976年3月1日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当时，我在法庭曾呼吁：因为我发表声明要求为这个国家的名誉实现民主化、改正不合理的“富益富，贫益贫”的经济制度、打开统一的大门，便给我判刑，那么，不免使人担心，这个国家司法部的独立性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体面将会大受

损伤。

我衷心呼吁，司法部必须弄清是非，努力保持体面。

对于政府，我还是抱有同样的心情。不论在1980年发生内乱阴谋事件时也罢，或者在1986年发生“五·三仁川事件”时也罢，我都抱有这种心情，就是在今天也依然如故衷心希望能够同政府进行对话，这就是本人目前的心情。

（《统一评论》1990年第四期）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zNjkxNz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369177.zip",
    "filesize": 11889670,
    "md5": "65fd4530940b33f7528c8a0e2beef230",
    "header_md5": "2f3071deb240af54040e4e4d93c92128",
    "sha1": "542c36ec5dd1d46472b8ee3145c98dcd9d572b5a",
    "sha256": "a95e66a476318079f7a1ac98198a32d77aba14909545630afdb1041748caea20",
    "crc32": 170132072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31134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7,
    "pdg_main_pages_max": 117,
    "total_pages": 123,
    "total_pixels": 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zNjkxNz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369177.zip",
    "filesize": 11726480,
    "md5": "41ebf4feecca469d1826f8ba1804b36d",
    "header_md5": "4ebee5ed193dce8b3b20f920150532fc",
    "sha1": "a7cbc7b312d2d30393ebc347c94825e59f14a080",
    "sha256": "2902cf12e5f9e6ae77bde0e091d11bdc3b1b72201266ca1aa55de68364e77f5e",
    "crc32": 50034908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29529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7,
    "pdg_main_pages_max": 117,
    "total_pages": 123,
    "total_pixels": 82278144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